

邵鼎勛著

認 識 蘇 聯



建國書店印行

748.3
329.3



認識蘇聯

(第一輯)

目次：

- 一、蘇聯的外交政策…………… John Foster Dulles 著
- 二、蘇聯新五年計劃下的人民生活…………… John Fischer 著
- 三、蘇聯的統治階級…………… John Fischer 著

748.8
329.3
2:1



3 0661 2220 5

蘇聯的外交政策

本文作者達爾斯 (John Foster Dulles) 爲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之一。倫敦外長會議時，達氏曾任美國務卿貝爾納斯顧問。舊金山會議時，渠亦爲美國代表團之一員。上屆美國總統競選時，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以達氏任外交顧問。當時杜威果當選，達爾斯必爲國務卿。然今日達氏仍以名律師之身份，活躍於美國外交界，其言論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極大之影響力。茲特譯出，藉使國人明瞭蘇聯之外交政策，暨美國一部分輿論對於蘇聯政策之觀感。

單從一個國家在朝官員的言論上，是不能明瞭這個國家外交政策的真實內容的；要明瞭這個國家外交政策的真實內容，更重要的還是研究這個國家的領袖所膺服的哲學和這個哲學在實際行動上的表現；把這許多實際行動的表現，一件件湊集攏來，往往可以得出一個可靠的結論。就以蘇聯情形而言，實際行動的表現很多，這許多實際行動的表現都可以絲毫不爽地湊集得攏來，形成一個緊湊的和合乎邏輯的整體。

創立蘇聯外交政策的人堅持着世界是「整個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這許多辭令是他們



(附)

向我們提出的口號，是他們勾搭我們的字句，但確是蘇聯外交政策中的基本前提。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在爲自己建立和平，爲自己建立安全，爲自己創造機會。其實，和平，安全，機會是任何一個國家對外政策中的目標；不過，因爲在蘇聯的領袖們看來，世界是整個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們覺得要獲得和平與安全，必須消滅非蘇聯式的社會，原來目前非蘇聯式的社會把世界分成兩半，這兩半是矛盾的，同時也是危險的。蘇聯領袖們覺得消滅非蘇聯式的社會是對世界有好處的，因爲蘇聯式的無產階級獨裁自始即在增進大眾的福利，消除人對人的剝削；他們覺得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獨裁的政府乃是一個理想的政府；他們覺得這樣的作法才是真正的「民主」，凡是跟這種作法相反的政治思想或宗教信仰概爲「法西斯蒂」和「非友誼」。

蘇聯的演說家和蘇聯的作家對於「民主」，「法西斯蒂」，「非友誼」等名詞所下的定義，實在有弄個清楚的必要。以往，我們沒有把它弄清楚，結果，我們總是先同意蘇聯領袖們所說的話，到後來才發現他們言行的不相符。蘇聯領袖們說他們外交政策的目的希望任何地方都有「民主」政府的存在，這個「民主」政府是「友誼的」，而且會消滅「法西斯」思想的。蘇聯的作風似乎很合理的，我們不能妄議一辭；然而一當我們發現蘇聯所謂「民主」「法西斯蒂」和「友誼」等名詞的含義時，情形就不同了。



在俄文中，「民主」一詞的含義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獨裁；

在俄文中，「法西斯蒂」一詞是應用來譴責非蘇維埃的信仰的；

在俄文中，「友誼」是一個讚美詞，讚美那些信仰蘇維埃的人，讚美那些實際提倡蘇維埃來證明其效忠於蘇維埃的人。

這樣的解釋起來，蘇聯政策確是一個剛愎狹窄使人難以忍受的政策。它要想盡方法消滅構成自由社會的要素，它之所以要想盡方法急切地達成這個目的，因為蘇聯領袖們相信在這個目的沒有達到以前，和平始終是不穩定的；他們覺得容忍非蘇聯式的思想乃是一種懦弱的行為，懦弱便是危險的。

維辛斯基 (Vishinsky) 在第一次聯合國大會中曾發表一篇有關難民救濟的演說，他說：「我們不打算容忍，爲了容忍，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多的代價」。因此，他的結論是，即使是一個最低微的難民，即使是一個最可憐的難民，祇要他存着一點與蘇維埃共產主義相反的思想，他在這地球上跑來跑去，總無形中使蘇聯的和平與安全受到威脅。

蘇聯領袖們覺得要消滅這種潛在的威脅，最簡捷的辦法便是在世界各地成立一些都會接受蘇聯哲學的政府，這許多政府將建立一個極嚴格的檢查制度和祕密警察，來偵察政治信仰不同的人

物，把這許多思想不同的人選出了社會使他們變得毫無作用。如果這許多政府能够遍及世界各地，而又能掌握大權，那末蘇聯領袖們便可以創造出一個世界和諧，一個政治上的大鎮定，這個政治上的大鎮定便是「蘇維埃和平」。

蘇聯的計劃

蘇聯爲要實現他的政策，把世界約略分爲三部分：（一）內圍，即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本土；（二）中圍，即是環繞內圍四周的警戒線；（三）外圍，即是除內圍和中國以外的其餘世界各部分。

內圍

蘇聯的內圍即指蘇維埃聯邦本土而言。包括一九一七年原已建立的蘇聯，再加上此後根據歷史，戰略，傳統等關係而混和進來的鄰近土地。這一區已擴張得很多了。從一九一七年所建立的蘇維埃聯邦西北角起，經南至東，而止於海參威成一大弧形，在這大弧形裏面增加了下面的許多土地：

芬蘭北部

芬蘭南部戰略地帶，沿芬蘭灣控制出波羅的海要道

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東普魯士北部

波蘭東半部

捷克斯拉伐克東部（即克爾巴阡烏克蘭）

羅馬尼亞之一部，包括巴薩拉比亞和布哥維納

唐努烏梁海

旅順

庫頁島南半部

千島羣島

蘇維埃制度是一個聯邦制度。它有一個計劃好的憲法，故意使新民族和新領土的吸收非常容易。因此蘇聯的領土擴張是沒有止境的。現在蘇聯竭力想從土耳其那裏取回卡斯（Kos）和埃爾蘇

龍(Bashan)兩省；同時，蘇聯把在中圍的各種半自治鄰邦也視為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未來領土。

中 圍

所謂中圍即是環繞內圍四周的領土，這許多領土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加入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時期；不過它們接近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便於蘇聯軍事力量的制御。這一地區，有的曾一度被蘇聯軍隊所佔領過的，有的是現在就為蘇聯軍隊佔領的，有些地方現在雖然沒有佔領的事實，却無時不在被佔領的恐怖中。這許多地方的政府名義上雖然是獨立的，而且在某幾點上也確是獨立的，但他們周圍的誘惑力很強，他們的外交政策，他們的軍隊，他們的祕密警察及檢查制度都被迫交由莫斯科指導的人員去管理，尤其是祕密警察和檢查制度兩項。因為如此一來，這許多政府的性質是「友誼的」，蘇聯領袖們便可高枕無憂。

在歐洲大陸上，從波羅的海起，即是從丹麥的東部起，經德意志中部到亞得里亞海再向南行而至於希臘邊境止，可以劃成一線，在這線的東部，「中圍」的情況有時嚴重，有時輕鬆，其間頗有變化。中圍的中歐部份包括：

波蘭

德意志東半部

匈牙利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南斯拉夫

阿爾巴尼亞

在亞洲部份包括：

外蒙古

東九省（這裏蘇聯有參與大連及中東路之管理權）

高麗的北半部

中國的新疆省（這裏從蘇聯滲入的勢力相當可觀，但迄至今日為止未有正確之情報）
蘇聯的中圍地帶是不固定的，下面這許多地方，他還可以經常的擴張：

希臘（這裏蘇聯支持下的共產黨和其他希臘黨派間的鬥爭極為激烈）

伊朗（這裏亞塞爾拜然省的北部會為蘇聯所佔領現在正在叛變）

土耳其（現正受蘇聯的壓迫）

庫爾特斯坦（這裏蘇聯正在鼓勵庫爾特人成立一個在蘇聯保護下的自治邦）

外 圍

第三個區域便是外圍，外圍包括世界的平衡勢力。它的地域相當遠，顯然不是蘇聯陸軍力量所能及得到。因此，「友誼的」政府決不是運用直接力量的辦法所能夠建立的，蘇聯所運用的辦法，頗多變化，尤其是在自治區和非自治區，在自治區有一套辦法，在非自治區又有另外一套辦法。

殖民區域的人口總數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在這些區域內蘇聯領袖們所運用的辦法便是鼓勵獨立運動並給以精神上的領導。蘇聯領袖們所鼓勵的是激烈的革命而不是溫和的演進，因為激烈的革命容易產生和目前當政人物完全決裂的政府。

構成外圍的地區，一半是殖民地，其另外一半便是那些完全自治的國家。在有許多國家裏面，強有力的共產黨相繼崛起，並且和蘇聯領袖們取得合作。法國即是一例。在有許多國家裏面，共產黨或極端的左翼政黨，其本身還不够產生極大的力量。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便運用少數經

過嚴密訓練的人來發動力量。他們滲入大的黨派集團裏面攫取地位。在各大政黨的選舉力量不相上下之時，他們甚而能够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有許多國家的當政人物，他們的信仰非常堅定，他們的堅定信仰是和蘇聯的理想衝突的；但是他們的道德力量或政治力量是爲蘇聯所嫉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便運用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來達成他們的目的。他把這許多人的「污點」盡量宣傳。用這個「污點」宣傳的辦法來威脅便可以防止這許多人去作公開活動，或者使他們成爲任何政黨所厭惡的對象。

現在試舉幾個例來說明蘇聯在外圍所運用的手段：

一、國際間有一種發展是蘇聯所要防備的，這便是西歐諸國在政治上或經濟上的聯合。因爲法國，比利時，荷蘭，以及聯合王國都落在蘇聯中圍的外面，這許多國家如果一旦聯合起來便足以抵抗蘇聯在中圍的聯合，所以蘇聯非竭力設法使他分化不可。在這許多國家裏面，驅起了許多共產黨，他們和蘇聯共產黨取得密切的合作。幾個月以前，有一位法國政府官員談及法國與其鄰國的經濟合作時，他說合作是不可能的，因爲合作使蘇聯不高興。蘇聯想通過共產黨的勢力來造成法國國內的罷工，使得法國經濟的復興遭着嚴重的阻礙。

二、殖民地的人民有其自然的苦衷，有其未曾實現的願望。苦衷與願望都是由戰時的環境和

德日的宣傳所激起的，始而騷動，繼而很快地發展為激烈的獨立運動。蘇聯領袖們鼓勵殖民地人民訴之於暴動，而不主張他們去依賴聯合國憲章所訂立之程序，因為這個程序是緩進的。在第一次聯合國大會中，委託治理國自動把委託統治地轉讓給聯合國的託治權，但蘇聯領袖們則並不希望聯合國大會嘉許這種自動採取的步驟。在倫敦和巴黎外長會議中，美國提出一個有關意大利殖民地的計劃，這個計劃保證殖民地的早日獨立，不過在獨立未完成以前殖民地的行政應該付諸聯合國託治會，然而，這個計劃却又為蘇聯所反對。

三、在外圍，有一個地方最為蘇聯所念念不忘的，這便是地中海，蘇聯的外交和宣傳都集中在這裏，他的企圖幾乎包括整個地中海的沿海線。但是地中海是英國通印度和遠東的傳統「生命線」所以現在蘇聯正在和英國爭奪這一區域的控制權。

控制地中海西部門戶的是西班牙以及西屬摩洛哥。這兩個地方現在是政治鬥爭極重要的場面。各大國間都同意佛朗哥應該去位，但問題是：如何去位？繼任者是何等樣人？英美兩國正在打第一個和平的繼位辦法，這個辦法將是自由主義的，而不是共產主義的。至於蘇聯領袖們並不反對西班牙內戰，因為內戰可以促成共產主義的掌握政權。法國以往曾徘徊於這兩種壓力之間，但目前却傾向於蘇聯方面。

蘇聯領袖們費了很多的心血，想控制法國的外交政策。在倫敦外長會議中以及安全理事會中，蘇聯代表運用種種方法去與法國外長皮杜爾以法國天主教黨的領袖為難。近來，蘇聯採用了一個特別的手段，一方面他自己是要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援助，但一方面他却又將小麥通過共產黨分給法國，因為這樣一來，他便可以協助共產黨在法國奪取政治勢力。

在意大利共產主義也正在提倡中，和中間黨處於敵對地位，同時蘇聯竭力宣傳英美軍政府的錯誤。

蘇聯又在向阿刺伯試探了。在安全理事會中，蘇聯的建議極為激烈。他要求英法軍隊撤出敘利亞和黎巴嫩。蘇聯並且鼓勵在法屬摩洛哥，阿爾及爾，和多尼西亞等地的暴動。蘇聯想盡方法利用阿刺伯來反對巴拉斯坦的政策，而巴拉斯坦的政策乃是美國多數人所贊同的。

四、在拉丁美洲，有許多共和國都遭遇到戰後經濟的困難問題，許多工人——工業方面的和農業方面的——沒有享受到好的生活水準。這又是共產黨的一個宣傳機會。極端左翼的煽動家利用這一機會來攻擊美國所會竭力倡導的拉丁美洲大聯合。

五、蘇聯現在正在推動最近組織的世界貿易聯合會，想利用這個聯合會做工具來造成遍及全世界的政治勢力。目前世界各國中有世界貿易聯合會的組織團體的，已達五十餘國。國際勞工聯

合會即是世界貿易會的組成份子，它大約代表勞工的左翼（在美國便是勞工組織協會），在他們中間，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同情者均能同心協力，和蘇聯站在一條線上。

六、蘇聯的「污點」手段，最好挪墨西哥外長巴的拉（Dr. Ezequiel Padilla）的情形來說明。在舊金山會議中，巴的拉竭力贊助美國政策，大有助於南北美之聯合。但當他回至墨西哥時，墨西哥的左翼報紙便對他作極惡毒的攻擊，說他曾經受過賄，把國家出賣給美國，以求得政治上的援助。這樣一來，謠言便傳遍了國內，巴的拉不得不辭去外長之職。巴的拉的繼任者看出了這一點，於是在倫敦聯合國會議中，迭次投蘇聯的贊成票，以反對美國，結果，他得免於遭遇和巴的拉一樣的厄運。

技 術

蘇聯總覺得外面的世界是不純潔的，含有危險性的；因此他所應用的技術也根據這一觀點而來。她有一條普通的規律，這便是，不和人家來往，不和人家談親睦，除非和人家來往和人家談親睦時，能够使他的勢力滲進別人的勢力裏面發生作用。

蘇聯在內圍與外圍之間，築起「層」鐵幕（Iron Curtain）。這層「鐵幕」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對內的，一個是對外的。就對內的一點而言，這層「鐵幕」的作用在保持內部政治思想的「潔淨」；因為，蘇聯的政治思想是差不多經過三十年的宣傳和清除才獲得的，不但如此，這層「鐵幕」還可以防止內部的不安定；因為如果使蘇聯的工作人員一旦知道了英美各國的勞工生活是比自己的好，自然不免要發生不滿意的情緒。

就對外一點而言，有着這一層「鐵幕」的存在，外界便無從完全明瞭蘇聯內部的實際情形；外界不明瞭蘇聯內部的實際情形，因此使蘇聯的宣傳和影響更爲有效。蘇聯某幾部份未經德軍侵入地區的經濟狀況和中東與遠東那些落後的地方比較起來，自然是勝過一籌。然而，如果我們充分瞭解了蘇聯內部生活的方式，挪此方式來和別的地方比較一下，蘇聯的權威勢必減低。事實是，不滿現狀的人和理想主義者總容易稱讚蘇聯的實驗，以爲在此實驗中實現他們的願望是有可能性的。但他們把這種可能性過份的加強了；原來他們衡量這種可能性，用的是想像力，是表演式的展覽，而並不是現實。外面的人祇能够憑想像力和表演式的展覽來衡量蘇聯的政治實驗，以此使蘇聯的宣傳獲得極大的效果，這便是蘇聯的無價之寶。

在蘇聯的人看起來，外面的世界是非友誼的。這層「鐵幕」便是用來抵禦外界的防線。蘇聯要想盡量揭發外界對他的非友誼，不但過去是非友誼，即現在也是非友誼。蘇聯領袖們不但歡迎

這種足以揭發外界非友誼的機會，並且故意去尋覓這種機會。在舊金山會議以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大會中，蘇聯代表團幾乎常常提出議案交大家去辯論和公決。甚而明知議案之不免於失敗，也在所不計；因為，這樣一來，蘇聯就可以使得國內外的同志們看到外界確是在表演所謂非友誼或法西斯的戲劇。

當蘇聯在外僑民必然要和外界發生外交上或商業上之關係時，蘇聯要求他們嚴格遵守一個要點，即是，蘇聯民主不能容忍外國的思想，也不能和外國思想合流。因此，蘇聯的外交家以及蘇聯在國外的一切僑民都不願和信仰不同的人混合在一起；溫和的純粹社會性事件，他們有時也樂於參加，但他們很少討論政治性的，社會性的，以及文化性的事情。假使有人和信仰不同的人做了朋友或受他們的影響時，蘇聯一定把他召回國去，不過這是很少的例外。

有關世界合作的各種機構，蘇聯總是慢吞吞的參加，這也是蘇聯政策的另外一個實施。因此，國際貨幣基金會，國際建設銀行，聯合國糧食農業機構，臨時國際民航機構，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機構，歐洲緊急經濟委員會以及歐洲煤礦機構等等蘇聯都未曾參加。就是我們國務院邀請各國參加國際貿易機構建設籌備會議的發出的請帖，蘇聯也沒有接受。

蘇聯之願意做聯合國會員顯然是一個例外。從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會議起，蘇聯就已參與

創建世界組織的各種步驟，因為在這世界組織裏面，蘇聯可以成爲主要的一員。在舊金山會議中，蘇聯代表團奉史達林的訓令接受某幾條憲章條款（主要的是允許在安全理事會和大會中得自由討論的條款以及第十四條有關「調整和平」之條款）而這許多條款是爲蘇聯所最不喜歡的。蘇聯寧願接受他所不喜歡的條款而不願國際間沒有一個普遍的國際組織，同時蘇聯也不願有一個把蘇聯除外的國際組織。

道理是如此，蘇聯原來想把世界組織做工具和英美兩國間同時統治世界。這個觀念是個要永遠保持戰時三巨頭統治的觀念。這種觀念早應該放棄，但是蘇聯依然希望有一個世界組織，因爲有了這個世界組織就可以防止西歐各民主國的聯合，有了這一組織就可以藉此在外圍倡導其世界和平的觀念。蘇聯領袖們希望能奪取西歐國家在聯合國中的絕對優勢，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便竭力去發揮在聯合國及其會員國中世界貿易聯合會之功能。同時，因爲安全理事會永久會員有「否決權」之關係，聯合國決不能對蘇聯的計劃有大礙處。蘇聯爲要保證本身計劃之不受妨礙，乃竭力促使「否決權」範圍之擴大，甚而擴大到安全理事會中的討論。

蘇聯外交政策的後盾是他的軍力。蘇聯的軍隊固然有一部份已經復員了，但蘇聯曾經公開的申明：他要維持一支強大的陸軍力量，要發展空軍力量，並且要很快地發展海軍力量。蘇聯之所

以要發展海軍力量，因為蘇聯已經在波羅的海，地中海和黃海方面獲得了出海口，在各處水路上都有海軍的用途。同時，蘇聯領袖們也正在埋頭苦幹研究如何使用原子能。他們認為武力是主權的主要部份，史達林在一九四六年的五月演說中曾說過蘇聯將視武力為「掌上之珠」。討論到和約時，蘇聯代表竭力反對國際監督，甚而反對監督已被擊潰的敵人。

蘇聯的外交政策在一種嚴格的，機械的，和不妥洽的方式中實施。蘇聯的政策無論是戰略的也好或是戰術的也好，總都在莫斯科製定的，並且受莫斯科的指導的。在莫斯科製定或指導政策的人，他們本身都不明瞭外國的情形；他們製造出來的計劃乃是根據蘇聯觀點上的邏輯。在他們看起來，蘇聯的政策像是一着棋戲，世界是一個大棋盤。蘇聯外交人物的一切行動以及蘇聯在國外私有機關之一切行動，都不是隨便的，它們都由傑出的人物擬出來的。蘇聯外交人員，實際上並沒有一點自由裁量之權。甚而外交主腦如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等人物，在大的問題上，如果不向莫斯科史達林以及共產黨政治局請示，他們是不作自由行動的。

蘇聯外交政策的有力處

蘇聯外交政策之所以強而有力，因為它是國內政策的延展；蘇聯國內政策實施的結果，自然

而然要引申出這麼一個國外計劃。蘇聯內部政治上的和諧，是由一個統治集團去完成的，這一個統治集團自己担負起爲無產階級謀福利的責任，同時獲得了一個權利去摧殘求知的自由，因爲求知有了自由，大家便可分頭發展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和諧。

在有幾件事情上，蘇聯制度是寬容的。最顯著的是關於各邦居民間倫理觀念之差異。其次，在蘇聯，當大家討論科學，天文學，生物學，藝術，音樂，歌舞，文學以及類似之學科時，大家都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自由地辯論。關於宗教，祇要它僅是崇拜偶像的儀式，也是容許的。至於有關政治性的事件，容忍是沒有的。在蘇聯，國家是至高無上的，國家的意見便是法律——不是法典，而且是道德律。凡是政治思想或宗教思想有和國家的意見相衝突時，概被視爲罪惡，不可容忍。

達成國內政治和諧的方法，一是用宣傳來說服，一是用武力來恫嚇和鎮壓。

蘇聯領袖們現在想以整個世界爲對象，做他在國內所曾做過的事。這也就是蘇聯的外交政策。它是自然而然的，它是簡單的，它是主動的；蘇聯外交政策之所以強而有力，其原因在此。

蘇聯外交政策還有一個力量，這力量之發生便是由於這個政策是革命性的。變是生活的通則

，追求變的人便得享受順應時代潮流的愉快。因為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動的，所以它能够吸收那些主張以激變爲可以促使世界改良的人，它能够吸收那些主張推翻現狀爲可以獲得個人利益的人，它能够吸收那些向來不滿意於自身命運的人。

當蘇聯外交政策進入一個無信仰，無秩序的空虛世界中，他那動的一面更見得有效力。亞洲，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地方都缺乏健全的社會。戰後歐洲大陸的大部，也因對德態度之躊躇與鬆弛而趨於腐化。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英美兩國曾發現了幾個很大的缺陷，一是帝國主義以及隨帝國主義而產生的種族偏見，一是維持正常生產的失敗，與失業問題的不能解決。蘇聯便針對這兩個缺點，提出「獨立」和「人人有職業」的口號。我們總還記得，蘇聯會要求把這個口號規定在聯合國憲章上，但蘇聯的努力引起了極大的反抗，結果，蘇聯的主張是勝利的——附有條件的勝利。這一插曲使得蘇聯領袖們相信外面的世界確缺少道德上的領導，很容易使之歸向於蘇聯那個具有活力的新信仰。

最後，蘇聯有幾件大成就，也足以使他的政策獲得鼓勵。就國內論，俄國人是勇敢的，是堅苦的；蘇聯能够在勇敢堅苦的人民身上激發他們對國家的忠誠，給他們以相當的訓練，結果德意志的戰鬥力完全被擊潰了。這是一件驚動全世界的大事。就國外論，蘇聯政策已經使本國擴張了

不少的領土，實現了沙皇時代的大部份願望；在某幾點上說，蘇聯現在擴張的領土，甚而超過了沙皇時代的願望，同時他還繼續不斷的擴張。中國環繞着內圍，在中國政府都是順從蘇聯領袖們的意志的。在外圍，蘇聯的勢力也到處可以發生力量。任何地方，凡是投身政治的人，其一舉一動，都得先想想他是否會獲得蘇聯領袖們的歡心。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人物的勢力，從來沒有像蘇聯領袖們這樣普遍的。這種情形不過是在幾年以內造成的，這實在給蘇聯以一個極大的威力。

蘇聯外交政策的弱點

蘇聯領袖們以及散佈在各地的蘇聯信徒都相信「蘇聯和平」是可以不生一點波折完成的。然而，事實上，這樣一個看法不免把情勢估計錯誤了，相當的危險。這一看法，把最初的成就估計得太高；因為最初的成就是從戰爭中以及戰後的混亂局面中得來的，是趁着大家感到精神上或身體上的疲勞時得來的。這一看法，又把自己內部的缺陷和外部的抵抗力估計得太低。

蘇聯的政治建設配合不上實現這樣一個宏大而具有世界性的計劃；因為決定之權過份集中於上層，缺乏一個權力的代表者，同時處理對外事件的能力也還感到不足。

在歐洲，蘇聯把中圍由平時轉變到戰時，很快而且並未遇到各民族間之嚴重衝突。各野心家得到蘇聯的協助都一個個的掌握了政權或恢復了政權，但他們並不甘心情願地一輩子做着蘇聯的尾巴，在他們之中有幾個已經把這意思公開的表明了。

在外圍，蘇聯外交政策所依賴的完全是大眾對現狀的不滿。這於協助推翻現狀常常有其用處；但破壞時期過去，必須繼之以建設，當建設時期到來之時，蘇聯必將失去其國外之領導權。

蘇聯政策的另外一個基本弱點，便是他對那層「鐵幕」的依賴心。這層「鐵幕」或者暫時可以幫助蘇聯領袖們的宣傳工作，對外表示她自己已經獲得了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辦法；但這不是老是可以這樣做的；這層「鐵幕」勢將一天的召致外人的疑竇，大家總想看看幕後究竟是什麼。如果大家沒有辦法看得到，他們將斷定蘇維埃制度並沒有好的成績，經不起公正的觀察和比較，因此過份依賴此種人爲的助力是蘇聯政策中的一個基本的弱點。

還有一點，蘇聯的估計是最錯誤的。西方世界最厭惡行苦，最愛好自由，然而蘇聯又把他們估計錯了。

蘇維埃制度是殘忍的。蘇維埃制度的殘忍特別表現於消滅異己者的過渡時期中，蘇聯要把整個人類大眾都納入蘇聯的同一典型，這自然需要實際的動作，在完成這種實際動作的過程中，要

一點不發生困難，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內部的政治暗殺事件，層出不窮。許多人都被秘密警察逮捕了去，原因是他們的政治信仰有問題；成千百萬的人民都被剝削得無以立足，窮困以死；成千百萬的人想盡方法逃出蘇聯的佔領區；許許多多的難民甯願自殺，而不願被遣送到蘇聯的中國或內圍去。蘇聯把人類生命的價值看得太低了，蘇聯在達成全體一致的過程中所運用的手段，太殘酷了，曾經享受過人類文明的人是爲蘇聯所不相容的。

我們批判蘇聯的計劃是很正確的，因爲我們不僅根據他們所申述的目標，而且還根據他們的手段。因爲蘇聯民族曾經一度極堅強地抵抗過希特勒的進擊，所以現在我們總把他們另眼看待，覺得他們是勇敢的，是有自我犧牲的精神的；他們的軍隊，他們的政客，他們的秘密警察在鄰邦的所作所爲，我們總喜歡替他們掩飾。然而，一當他們的手段被人識破時，他們必然會遭遇一種強烈的抵抗。奧國和匈牙利首先認清蘇聯的手段，因此在選舉中，共產黨已經整個的失敗了。

蘇聯政策中對於自由的制壓更將引起最劇烈的反抗，截至今日爲止，蘇聯的成功大多在那些個人自由還沒有充分被享受的國家裏面。至於在自由已經被享受的地方，替蘇聯政策撐腰的人祇敢談免於經濟恐懼的自由，對於政治的自由和宗教的自由，他們是緘默不言的；因爲這兩種自由

是蘇聯所要消滅的。蘇聯計劃具有鎮壓性，當此鎮壓性被人發覺之時，反抗隨之而起。

在組織的勞工階級裏面蘇聯推動他的政策最爲活動，他提出的諾言也最多。然而，就在勞工階級中以及在社會主義者方面，現在也起了最有效的反抗。目前各政府中反抗蘇聯剛復自用的政策最激烈的，要算，是不列顛帝協的工黨政府。其代表人物如英國的貝文（Mr. Bevin）澳大利亞的伊瓦特（Mr. Ewart），新西蘭的法爾薩（Mr. Forster）。美國的工黨領袖是瞭解美國個人自由的，同時也重視美國的個人自由的，他們正在努力防止共產黨奪勞工組織的控制權。換句話說，在已經有自由的民族中，反抗蘇聯最強烈的人也就是與蘇聯的手段接觸得最多的人；而且這許多反抗蘇聯的人是屬於普羅階級的，是屬於最爲蘇聯所期望的一個階級的。

當美國人進一步瞭解蘇維埃制度之整個含義時，他們一定會犧牲他們的生命，犧牲他們的財產，犧牲他們的神聖榮譽來爭取他們的個人自由。這是絕對可以確定的。

我們的行動必須根據一個假定；要是蘇聯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他是決不會成功的。

假使一個大國的領袖已經在推行一個外交政策，而這個外交政策又勢必引起我們的激烈抵抗，那末，我們設法對付這一政策的時期便是現在。我們必須假定蘇聯的政策決不能成功的。我們把這點弄清楚得愈快，轉變那個政策的危險部份也愈有可能。

我們已經戰勝了德國和日本，我們覺得，我們已經贏得了應該休息的時期。當此之時，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再碰到一個新的國際大問題；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看到，危險從一個對勝利有輝煌貢獻的國家而來。有許多人僅僅看上蘇聯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標，覺得這目標是好的，於是避免討論問題的焦點；有許多人明知蘇聯政策有其殘酷剛愎的一面，但他們抱着一個希望，希望這殘酷剛愎的一面祇限於本土，或則這殘酷剛愎的一面祇是暫時性的；有許多人深信沒有一個國家是希望戰爭的；或者蓄意挑動戰爭的；有許多人覺得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惡劣的情勢一定會發生，不願意作杞人之憂。

然而，這許多觀念都足以促使戰爭的爆發；因為他們都可能是一些錯誤的估計，戰爭往往從錯誤的估計中產生。

真的，沒有一個國家是希望大規模的戰爭的，是希望一個未能斷定勝利誰屬的戰爭的。這情形幾乎常常如此。普通，戰爭總是由錯誤而起。當一個國家的領袖拚命地開疆拓土擴展其勢力範圍時，他們一定估計在這許多地方是不致遭遇着反抗的。當他們確沒有遭遇到強烈反抗時，這證明他們的估計沒有什麼錯誤，於是他們又往前做去。如果國內有人提出忠告時，這許多人便變為不被信任的人物，領導權就集中在更殘酷的人手裏，更有機會作惡。但到了最後他們才發現他們

是估計錯誤了，因而感到異常的苦惱。

Y 假定我們將有另一次戰爭，那末這次戰爭便很可能就從這種方式中爆發。沒有一個人去蓄意計劃戰爭的，戰爭將是估計錯誤的結果。在二十五年中美國已經二次牽入戰爭的漩渦中，因為美國人民最後感覺到歐亞兩洲的侵略政策實大大地威脅到民主的觀念和我們個人自由的理想。外國的領袖們如果每一次都能及早覺悟到美國的反應一定會跟他以往的反應一樣的，那他們也許會另闢途徑。但我們沒有在適當的時期把我們效忠於理想的決心作極明顯的表示，我們自然也不能推諉忽略的罪過。我們千萬不可在同一世紀裏面犯了三次相同的錯誤。

X 改變蘇聯計劃的可能性

現在有一個問題或者可以提出：我們所能够做到的事是否可以使蘇聯的領袖們自動地改變他們的對外計劃。沒有一個人能够肯定地答覆這個問題。蘇聯的外交政策裏面似乎含有必然要做的事。蘇聯領袖們相信某種個人的自由是含有危險性的。他們已經在國內消滅這幾種自由，正好像在其他地方的政府撲滅危險細菌的傳染物一樣。然而，在國外，蘇聯領袖們所恐懼的自由是極普遍的，而且此種自由有高度的蔓延性。因此，蘇聯領袖們爲防止本國土地被外界沾污起見，乃

築起一道屏障，使本國人民和外界隔離。然而，這決不是一個永久的辦法，這祇是一個自己囚己的方式。這個方式在能幹的野心家看來是不妥當的；他們曉得自己的國家是一個世界的強國，總希望這個強國將來能夠變成全世界的主角。這樣一來，他們便在世界各地拉攏國外的政府來參加自己的清除運動。在蘇聯的領袖們看起來，祇有這樣世界才得安全。

我們自然可以說，祇要蘇聯的對內政策不變，其對外政策自然也一定不會變。但是，人類的事件不一定完全依照邏輯標準發展。現在的蘇聯領袖們已不如其前輩之瘋狂；為求有利於進展，他們在對內政策上已經改變了不少。今日所謂俄國「共產主義」在經濟的觀點上說，與馬克斯所講的共產主義大不相同，與列甯和克羅斯基時代的共產主義也各異。幾年以前，蘇聯總覺得完成世界革命是一件神聖的任務；但到現在此種意義也有些改變了。現在蘇聯的外交政策趨於實際，以保證蘇聯安全為其第一着。

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外交，以努力於估計機會為其特點。蘇聯的外交代表有時走向極端，因此遭遇着意外的抵抗力，但史達林則又縮了回來，緩和了緊張的空氣。所有這許多事實都在說明；蘇聯的外交政策是順從變的，假使事實能够使蘇聯的領袖們充分地瞭解他們的政策是不切實際的，在事實上是不能保證蘇聯的安全的。

然而，老是猜想克姆林宮究竟會計劃出一些什麼東西，不見得就有什麼好處，這在學術上可以當做有趣的消遣，但一個局外人却不能從這種方式中獲得實際上的指導材料。從行動的觀點來看，程序是非常清楚的。我們的作法必須根據一個假定，假定我們一定能够做到使蘇聯領袖們改變他們的對外計劃。假使我們不能根據這一點向前做去，那末我們的失敗是無疑的。譬如，如果我們以為蘇聯的領袖們是不會改變他們的對外計劃的，那末我們非投降即戰爭。如果過去是導師，那末戰爭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們應該接受變的可能性，以此為有效之假定。

還有一個有效的假定，是我們必須做到的。我們必須假定我們要促成蘇聯外交政策的改變乃是一件艱難的工作。蘇聯的政策乃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基本哲學和內在生活的反映。這一政策已獲得了初步的成就。要蘇聯的領袖們很快地改變此種政策，乃是很難期望到的。困難之所以日益增加，在乎蘇聯的領袖們不明瞭世界的情況。因此，我們要促使蘇聯的領袖們改變他們的對外政策，我們所設計的計劃必須是極精到的，必須是強有力的，必須是為全體美國人所一致擁護的。

美國的政策

美國人在今後數年中的基本目標，應該盡量發展幾件事實，這幾件事實足以明顯地表示，現

階段的蘇聯外交政策是不會成功的。這些事實甚而要顯示給在克姆林宮內部的人物看。這樣，他們也許會改變他們的政策。循此方式同時也祇有循此方式我們才能够避免由於估計錯誤而造成的另一次戰爭。

然而緊要的是我們應該發展一些正確的事實。

關於這件事最容易犯錯誤。事實愈來愈明顯，蘇聯的計劃威脅我們的生活方式，威脅我們所膺服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我們的反應可能很激烈並且很笨拙。有人要我們完全信賴武力和經濟力，使用此種力量去壓制蘇聯領袖們。

這樣一個計劃可能是要失敗的。蘇聯的領袖們不是那種易於制服的人，他們不希望有大規模的戰爭，尤其不希望有他們不能獲得勝利的戰爭。但是他們是非常堅韌的，他們不怕打仗，他們也不能任意受人逼迫。

其次，像這樣一個計劃將促成我們自己內部的分裂。許多美國人對於蘇聯實驗（Soviet Experiment）所申述的社會目標，極表同情。他們之同情蘇聯實驗，正如前一世紀中許多外國人都同情「美國大實驗」（Great American Experiment）一樣，美國人是不願意把蘇聯實驗摧毀的。

即使我們把它摧毀了，仍然無濟於事，這樣的作法，並不能消除一個愛好個人自由社會的反

對力量；相反的，反對的力量或者更比以前厲害。因為蘇聯的實驗不敗於我們的道德，而敗於我們的強權；他的新信徒勢將到處崛起。

如果一個計劃祇是反對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這個計劃很少有良好的結果。凡是成功的計劃，其本身乃是建設性的，和創造性的。當此緊要關頭，我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肯定的表示，表示我們的自由社會依然有其美德，此種美德乃爲此一社會存在之條件。我們必須表示，我們這塊自由土地不是一塊精神上容易淹沒的低地，乃是一塊高地，它最能供給精神的，學術的，以及經濟的條件，此等條件乃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像這樣的一個計劃，所有的真正美國人都能同意，像這樣的一個計劃將安然達成我們的目的。

每一個文明總要遭遇到週期性的挑戰。這原來是用不着抱怨的。世界就如此地在動着。我們爲了對付目前蘇聯外交政策對我們的挑戰，我們必須表明下列幾點：

第一，我們膺服着信仰自由和求知自由，我們的心極純正；我們之所以這樣，爲了我們自己，也是爲了別人。但這兩種自由是蘇聯所要剝奪的。我們願意犧牲一切來保存這些自由。

第二，這許多自由，過去曾經對人類有過光榮的貢獻，目前依然是人類經常發展自己的工具。

我們要找幾件事來作如此的表示，並不是很難的。我現在提出幾點建議，不過這幾個建議主要的是爲着說明的方便，因爲要解釋得詳細無遺，乃是做不到的。

一、有一個最有意義的表示我們可以提出的，這便是宗教的觀點。個人爲什麼有自由，一個四海皆準百代不惑的理由便是：人類是上帝造出來的，他是上帝的兒女，他是上帝的化身。因此，人格是神聖的，國家決不能蹂躪它。我們的前輩是信仰這許多道理的，他們在獨立宣言中寫明「上帝把某幾種不可轉讓的權利賜給人類」。他們爲實現這一宣言而奮鬥，他們建立了一個政府，這個政府必須爲民衆保持「自由的幸福」。這個政府不得侵犯權利法典。如果這個宗教信仰離開了我們，那末個人的自由主要的變成了個人的滿足。要保留這許多自由就是要達到自己肉慾上的滿足。在此種情形之下自由當然是危險的。維辛斯基說得不錯：「限制一個人的意志與行動有其絕對的必要」。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面，所謂限制，主要的是指道德規律的接受，以及自由人自我節制自我訓練，自我犧牲的運用。如果一個社會失去了宗教性，或者說一個社會受無神論所指導，如蘇聯的情形一樣，那末在這個社會裏面，人類的自由一定被視爲和野獸的自由一樣，這個社會一定壓制自由使得大家像馴服的動物一樣，更順從更穩定。然而蘇聯應該知道，他們用來反對我們民族的那個計劃乃是行不通的，因爲我們的民族相信自由是從上帝那裏得來的，我們使

用自由有了節制，這種節制也是上帝所允許的。要摧毀任何基於摧殘人類自由的世界計劃，我們必須重新恢復我們祖先的信仰。

二、我們可以提出的第二個表示，便是，我們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一服良藥，它有治療我們國家病痛的功效。

事實是很明顯的，自由社會並沒有失去為大眾推進福利的能力，西方的民主對於蘇維埃的挑戰，已有良好的答覆。蘇聯宣傳西方民主腐化。但西方民主的腐化早已成爲過去之物，政治上的帝國主義以及經濟上的放任主義正在衰退途中。

各殖民國家自己在聯合國憲章中訂定願意負起推進各附庸國家人民的幸福和他們的自由社會。他們不但形之於文字，而且準備把文字變成事實，即使事實現在依然還沒有充分，却能再進一步來消除帝國主義的。委託治理國（南非除外）同意託治權同時也同意獨立。最近紐西蘭關於印度的建議，英國關於印度埃及的建議都足以表示委託治理國已經認定：帝國主義和戰略優勢應該讓位於獨立權了。

在美國，我們也會努力盡量使我們的經濟秩序合乎人道。社會安全已經實現了，失業的魔鬼正在被驅逐中。

關於消滅頑固派的工作，我們也已經做得很多。我們的宗教團體會費盡量去解決問題正如政治領袖解決問題一樣，進步雖然是緩慢的，但確是實實在在的。

我們個人自由的制度就在此種方式中證明其有治療社會病症的能力，我們必須照此做下去，然而我們不能做得太快免得發生顛厥。我們一定要避免用法律和命令來醫治每一件事；因為法律和命令祇是統治我們的社會的，法律和命令祇是加重我們社會的負擔的，法律和命令祇是使政府變成民衆的主人而非民衆的公僕。我們必須把革新一事假手於信仰個人自由的人，他們不但信仰個人自由，而且他們能認清自由經濟的機會不存在事實上他們也隨之而不存在。要維護一個自由的社會，我們必須選擇資格極相當的領袖。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蘇聯制度那裏去學；因爲在蘇聯制度下，掌握領導權的人是一些一方面對制度有虔誠信仰的人，一方面又極精明適當的人。

三、我們國家的生命還有其重要的一面，這就是武力。大多數美國人都喜歡武力變得不重要——一部份是爲了理想主義的理由，一部份是爲了自私自利的理由。然而，假使我們忽略了我們軍力的建設，勢將召致蘇聯領袖們對我們的錯誤判斷。蘇聯的領袖們是信仰武力的，他們總覺得凡是有珍貴物品的人，要是他們是能幹的話，他們一定會維持相當的武力，來保護他們的珍貴物品。如果一個人不把自己的房門鎖緊，房裏一定沒有爲他看重的東西。當此戰爭剛剛結束的時

候我們便讓我們的軍力建設怠惰下去，無異疑的，蘇聯領袖們一定增強他們的自信心，而變得更有野心。他們便會藉此推想：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寶貴的東西留下來了。所以我們願意犧牲，不去防止損失。建設軍力的意義，如果依照蘇聯領袖們那麼去推想的話，我們就必須建立強大的軍力。建設軍力並不需要我們去變成窮兵黷武的民族，或者把遙遠的基地都當作挑釁之用。我們並不停止覓取聯合國憲章中規定的普遍的相互的裁軍，我們的祖先曾經在憲法中說過一支規律嚴明的民軍是「維護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所必要的」，我們現在所謂建軍就是要把這種精神用現代的眼光表達出來。

四、我們還可以在經濟互助的範圍中提出另外一個表示。假使我們是信仰一個講人道的社會的，我們就得幫助在窮困地帶的人民，假使我們是信仰一個人類自由的社會的，我們就得維持那些擁護並保持這社會的人的生命和活力。我們得向世界表示我們有自由的人民做我們的鄰居，乃是一件好事。

我們確已大規模的這樣做。而且我們主張還要多做。我們之向英國和其他國家作信用貸款，就是一個例子。這確是如此的而且也是應該如此的。

然而，我們所做的事却被個人自由的濫用大大地減少了作用。我們一方面努力地幫助別人一

方面又濫用了個人自由，這樣一相對照的結果使得別處的人民弄得莫名其妙，對於一個個人自由的社會大大地懷疑起來。

他們大多數人都在生活的邊緣掙扎。祇有當生產正常和運輸不間斷的條件下他們才能生存，他們看到我們國內的情形非常驚奇；我們的政府曾經答應運輸食品出口去救助正在饑餓中的人民，但是我們因為享有吃的自由，所以把食品的出口大大地減低了。生產與運輸乃是恢復世界繁榮所不可少的兩個東西，但我們的罷工自由却把生產和運輸停頓起來了。在這許多地方我們眼睜着我們是違背了我們的信念的。

美國人對運用自由的不注意以及對於全世界自由的冷淡主要的的是由於當局者沒有看清現在國際糾紛的真正性質，沒有把這性質簡單地告訴美國人，沒有根據遠大的眼光建立適合事實需要的政策。此種缺點應該趕快改正。美國人應該以行動作決定性的表示，表示他們是準備接受個人的犧牲來維護自由在此一世界中之活動的。現在的犧牲或者可以免除我們以後的更大犧牲。

五、在有許多地方因為作戰的關係，我們握得了實際上的控制權，在這許多地方，我們也可以表明我們自己。我們會為四種自由而戰，會為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正義而戰。在有許多地方現在還不可能實現這許多目的，但是在有許多地方如日本義大利及其殖民地，德國和奧國西部，中

國，高麗南部等等，祇要美國高興，他都能够給大家一個很好的機會去獲得我們所曾爭取的正義和自由。

麥克阿瑟將軍在日本已經表示我們所能做到的事。在另外的地方我們的行動好像我們沒有給大家自由和正義，一直到了正式的和平條約訂成，在和平條約中我們才表示我們是可以給他們以自由和正義的。事實上，有條約也好，無條約也好，總是那末過着生活，而且生活的方式也正

在形成。我們應該製造一個方式足以反映出我們曾經公開爭取的目的。

大體上，我們戰時以及戰後的外交之足以使蘇聯的領袖感到我們的不誠懇，乃是很自然的。在我們對蘇外交中，我們已經放棄了反蘇的原則，這樣似乎對我們有方便，例如，我們不願大西洋憲章把中國和波蘭等等國家的權利都出賣給蘇聯，在德意志我們也參與非人道的政策和不公平的政策，非人道的行爲和不公平的行爲。所謂非人道和不公平我們同時用此標準來譴責蘇聯的政策和手段的。在倫敦和巴黎外長會議中，我們才開始矯正我們的外交政策，但補救起來却大費氣力。

蘇聯領袖們之懷疑我們甚而更甚於我們之懷疑他們。他們是物質主義者對於高尚的表白抱着高度的懷疑。假使我們要想蘇聯領袖們把我們看爲主持公道的民族，我們堅持我們的原則，不但

是口頭的，而且是行動的，這實在有萬分的必要。

聯合國能做些什麼

以上我們並未談到聯合國也可以作為防止衝突的工具。我們所談的主要是我們應該表示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有活力的是根深蒂固的，外國人要想推翻這一種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同時也是期望不到的，我們期待蘇聯的容忍，但蘇聯的容忍是基於蘇聯的覺悟，覺悟到國際間的不容忍乃是行不通的。

我們盡量是切近於問題。任何一個社會，它所具有的健全德性一定常為它自己所依傍。人為的支柱是不能設計的，當一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它的活力和權威時，沒有辦法發明一個機械的公式來支持這個社會。事實是如此，而且應該是如此。

聯合國有極大的潛能，自然有其用處，不過聯合國也有其嚴重的限制，除非我們把這許多限制辨別得清清楚楚，我們的努力是白化的，我們的信賴是不着邊際的。

今日國際間的友誼關係受三種舉動的威脅，這三種舉動對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是有相當危險的，而這三種舉動又是聯合國所不能控制的。

(一) 強國使用武力，或使用更巧妙的方法去奪取弱小國家政府的控制權。

安全理事會中有二個案件足以說明這一點。一個是蘇聯軍隊在伊朗，一個是英國軍隊在希臘，這兩個案件，公開討論起來，英蘇兩國總是答應提早撤兵的，但是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並未到達事件的內心深處，即是說，一個假定中的主權國其政府受外在壓力，或滲入的影響是不是正當的？

安全理事會或者有能力喚起充分的輿論來防止採取粗暴方式的強力政治，這自然是要緊的，但是如果祇是把強力政治作一個形式上的驅逐，還是不夠的，因為暗中活動的途徑很多。美國在擴張時期中對於坦克薩斯 (Texas) 和巴拿馬會使用過地下方法，從那時候起，技術乃一天天的完美。這種技術是安全理事會所不能防止的，因為，假使滲入的工夫完全成功了，本地政府在滲入的力量下是會予以寬恕的。假定滲入祇是部份的成功，那末表現於外面的可能是內戰，無論是那一種情形，聯合國勢將束手無策，因為一動便是牽涉到表面上的內政問題。此種內政雖然是在形式上的。

此種情形使得大大小小的國家感到異常的憂慮，小國人民也許已經有了在大事件上祇為外國主人服務的政府，這就是蘇聯中區計劃的精義。同時，大國也看到他們的地位蒙受這些手段的威

蘇聯在地中海和中東的政策使英國的領袖感覺到他們國家的危機正不亞於隆美爾 (Rommel) 直搗埃及門戶之時，共產黨在拉丁美洲的活動使得美國的人民感覺到門羅主義和遮浦脫柏克主義 (Chapultepec Doctrine) 已第一次遇到極嚴重的挑戰，在另一方面，蘇聯的領袖們覺得除非他們也像在中國一樣的做法，自己反會臨到同樣的遭遇。

如是，由於國際間存在着的種種聯合國所不够對付的舉動，恐懼便籠罩着人們的靈魂。

(二) 還有一個舉動，這個舉動，依照蘇聯領袖的說法，是使他們非常恐懼的。這便是我們使用自由時所激起的仇恨。維辛斯基說過濫用自由會促成「侵犯聯合國會員之罪」。莫洛托夫在倫敦外長會議中曾提出責備，他認為我們替羅馬尼亞所求得的出版自由並不能反映出一個高尚的原則，不過是想在羅馬尼亞造成一普遍的輿論與蘇聯為敵，莫洛托夫又指出蘇聯的憲法(第一二三條)規定激發種族仇恨或種族蔑視是要受責罰的。同時他要求一個國際性的保障防止激起對蘇聯的仇恨和蔑視。

這樣一個申訴來自這樣一個國家在我們看來似乎很奇怪。因為蘇維埃共產主義本身即是煽動階級鬥爭的。不過，蘇聯領袖們所表示的憂慮或者是純正的，因為他們老是在恐怖中過着生活。但是在國內他們至少可以用出版或言論來防止公開的攻擊，蘇聯已在國內防止了三十年，現在他

們又開始恐懼外界，因為在外界的人們可以自由地批評他們的人，可以自由地批評他們所維護的制度。但是這種恐懼幾乎是不健全的。在蘇聯的領袖們看來，出版和言論的自由似乎是具有危險性的，但聯合國却沒有一個機構是用來對付此種自由的使用和濫用的。

(三)造成國際間磨擦的另一舉動便是利用自由來毀滅自由。蘇聯的計劃利用我們出版和言論的自由以及交換意見的自由想把我們轉變成一個壓制那些自由的社會。蘇聯的計劃引起了極尖銳的憤慨，因為蘇聯這樣地利用了我們的自由而同時又否認我們有考驗他們的自由，他們向我們描摩許許多多的事物，我們自然也有考驗他們真實性的自由，這樣一來我們的社會似乎應該做一種防禦工夫，防禦別人來欺騙我們。然而，豎立一道報復性的屏障勢必增加相互的不信任，加強分裂的程度，真正的補救方法不是縮小出版言論和交換意見的自由，而是擴大這許多自由，好叫不同的民族可以互相瞭解彼此的真實性。然而，聯合國的機構却缺少實施補救此種病症的權威。因此，事實是非常的明顯，各國的行動是目前國際間彼此恐怖和彼此厭惡的原因，而聯合國又缺乏可以控制這許多行動的權力，這樣小國是被鎮壓住了，大國也可能陷於危險的境地。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可能被人濫用，「鐵幕」是用來阻礙文明的。

無疑的，聯合國將慢慢地啓發若干對付這些問題的辦法。聯合國大會具有廣泛的權力來鼓勵

國際公法的發展，聯合國大會可以通過經濟社會理事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以及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提供建立國際情報流通和防止某種自由被濫用的辦法，然而，這許多發展必然是緩慢的。題目是無可捉摸的，沒有一個一致性的政治或道德基礎可資建設。在這一階段內我們祇能期望挪聯合國作為「調解的中心」正如憲章第一條所規定的。

就目前看來，各會員國的注意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安全理事會上，在這裏，美國、蘇聯、和聯合王國共同展開一個公開的爭吵場面，繼續不斷的爭吵場面，這邊來一個演習，那邊便來一個反演習，這也許是無法避免的，而且會有良好的結果。然而，要是聯合國有一個另外的機構憑着同樣的努力來促進友好關係，騷動世界和諧的因素或者會減少了許多。

各會員國應該把聯合國大會看做全世界的市鎮集會（Town meeting of the World），在這裏懸在他們心頭各種實際問題可以用很禮貌的，和很坦白的方式來討論。而這種討論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無異疑的，我們在國內所維護的言論自由，以及聯合國費盡力量得來的權利都有使用的價值，如果使用得誠懇使用得不過份，它們都有助於誤解的消除，以及和睦的促進。

然而，聯合國如果祇是成爲各國表現歧異的地方，那他是不能保證國際和平的。聯合國必須成爲一個各國爲改良人類生活和促進相互利益而討論計劃的地方。這樣，友好的意識，相互容忍的意識以及相互信任的意識才會發生。這樣煩擾我們的種種惡勢力，才能從根本上消除。

這條路並不一定容易走得通的，因爲蘇聯不願意和自由的國家共同參與本分上的工作。但這是一種游離的現象，我們決不能接受這種游離的現象，我們決不能把這種現象看爲不能再變的現象。我們的策略必須充分，我們的意志必須堅決，堅決地覓取足以使蘇聯的公民會跟其他國家公民合作的方法，爲求此事更有可能起見我們還要讓聯合國來負起發動這件工作的責任。就目前情形而言，建議中的機構大部份都是由我們自己擬好的，大部份都是由我們來推進的，那許多和蘇聯官吏一樣不稱急的官吏也會做過同樣的工作，我們曾經邀請蘇聯來採取我們所會準備好的東西，或放棄我們所會準備好的東西。因此大家都認爲我們的方法和態度太武斷。即使和我們來往極密切的國家也在私底下抱怨了。要使各國能夠爲了相互的利益而合作，用聯合國一會員國的名義來做當比以往我們所做的更爲有效力些。

然而我們必須認識清楚聯合國不是可担保維持和平的，戰爭並未消滅，和平與安全主要的還是要靠我們自己。尤其要緊的，和平與安全要靠我們的表示，表示我們的社會是有力量的是生

氣勃勃的。要是別的社會能够摧毀我們，它勢將不願意摧毀我們，要是別的社會要摧毀我們，它也不能摧毀我們。

結 論

我們並沒有討論特殊的問題如伊朗問題，波蘭問題，的里亞斯德問題東九省問題，甚而原子彈問題。因為現在第一件基本工作是醞釀一種足以解決特殊問題的國際環境。

在一個變的世界裏面，維持和平的問題總是很難解決的，把和平的意義解釋為現狀的維持，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然而，假使一個動的集團拚命把些違反別人政治的和宗教的信仰的舉動加在他們的頭上強迫他們接受問題也是不可能解決的。

在蘇聯運用建設蘇維埃和平來求自己的安全期內，美國要盡力抵抗蘇聯政策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之下，伊朗問題不是有關油蘊的經濟問題，主要的一個為求進一步實現蘇維埃和平的政治問題。同樣的，當我們考慮到如何處置我們原子能的學問時，問題在：假使我們要傳達這種學問，我們是否傳給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領袖是接受平安度日的政策的，或者是恐懼異己和排斥異己主張用殘酷的手段把別人納入一個特殊的典式之中的。

祇有當蘇聯的領袖們表示願意放棄他們那個偉大的計劃，接受另外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蘇聯不過是許多國家中的一員，各人都得代表其獨特的生活方式，這樣妥協才有可能。我們仍然可以用「行動和示例」的方式——正如聯邦報紙（The Federalist）所說的——來爭取勢力，我們仍然可以希望我們的榜樣是好的各地的人民都將起來仿效的。但是我們必須讓我們勢力的擴張祇憑着我們的光亮，在人們面前照耀着使得他們都可看見我們的成績。蘇聯放棄在中圍和外圍所用的手段，我們也放棄我們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我們看來是防禦性的，但在蘇聯的領袖們看來是侵略性的，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們之間的緊張空氣將趨緩和，解決特殊問題的方法也可以找得到，正如一百三十年來解決我們與英法兩國間之問題一樣，如此一來我們或者可能看到永久和平的來臨。

蘇聯新五年計劃下的人民生活

本文譯自 Harpers Magazine 九月號，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往烏克蘭之代表費什爾（John Fischer）所作。按蘇聯政府原不准外人在其內地自由遊歷，此次爲要取得救濟總署的物資起見，特別許可該署代表至其內地監視物資分配情形。費什爾得此稀有之機會能與蘇聯老百姓直接接觸，因此，對於蘇聯新五年計劃之實施情形，以及在此計劃實施下人民生活之苦況，均有毫無隱蔽的觀察。茲特譯出，藉使國人明瞭鄰國國防建設之一斑。

三十年的堅苦生活

蘇聯的老百姓已經過了三十年的堅苦生活了；可是他們還得繼續再過十年或十五年的堅苦生活。如果以我們美國的標準去衡量蘇聯老百姓所過的生活，他們誠堅苦得殘忍。

再度十年或十五年的堅苦生活，這是一個任何人都會覺得受不了的景況；即使像蘇聯這樣一堅毅耐苦的民族，也不無此種感覺。蘇聯領袖們之出此計策，無疑的有些勉強；但他們覺得這

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他們預料世界之將有第三次大戰，幾乎是沒有什麼多大問題的了；他們預料第三次大戰一旦發生，勢必比第二次還要殘酷，更浪費。他們相信他們的國家必須使用所有的力量 and 所有的物資準備這一次戰爭。在他們看起來，再過十五年的緊張生活和再忍受十五年的犧牲，乃是爲了蘇聯生存所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二月九日斯大林曾經發表一篇演說，（我們美國幾乎全不注意這篇演說），概論蘇聯的戰後工作計劃。在這篇演說裏面，他向人民透露了一個很壞的消息；他告訴大家今後必須立刻開始三個或竟至三個以上的五年計劃，而這許多計劃的重心必須在重工業的建設（即戰時工業的建設），使得蘇聯的重工業足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相比肩。他說話時的語氣相當誠懇，幾乎是具有殘忍的誠懇。同時，他又警告大家，要是重工業不能建設成功，蘇聯決不能抵禦她的仇敵——資本主義國家的另一次進攻。斯大林諄諄告誡他的人民，並以過去的事實提醒大家的覺悟，他說，他在一九二八年也提出過同樣的警告，叫大家努力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至今看來，他的警告確是一點沒有錯誤。斯大林又說，在那時候「黨知道：戰爭正在醞釀，黨知道：我們的國家要是沒有重工業，便不能談國防；黨知道：重工業的發展必須愈快愈好，我們的國家要是在這許多方面落後了，便等於敗亡。」

工作重新再做一次

蘇聯人民的茹苦含辛，其代價則為重工業建設的成功，在戰爭中贏得了勝利。然而，這一場鬥爭，幾乎耗盡了國家的元氣，許許多多從艱苦中建設成立的工廠都被摧毀得殘破不整。現在蘇聯的領袖們相信同樣的工作——或者更多的工作——又必須重新再來一次。

當時蘇聯老百姓並不瞭解斯大林所透露消息壞到什麼程度。直到三月十五日政府將第一個新的五年計劃詳細公布時，才恍然大悟。這一五年計劃的文件中所規定的工作，的確是空前的；不但要把在此次戰爭中所摧毀的工業恢復過來，而且還要比戰前的水準增加百分之五十的產量，關於鋼鐵工業的計劃，務使其最後能够一年產生六千萬噸，或者使其超過美國平時的正常生產數量。在這五年以內，開始時必須建立一〇四個鑛鐵廠和三一五個煉鋼爐，重築九千英里的鐵路，修復被德國所毀壞的一千八百座橋樑；並且還要完成四，三三八英里的新鐵路線，七千五百多的火車頭和四七二，〇〇〇的貨車。

在這一計劃中，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機器工具的增加。機器工具是戰時工業的核心。依照此計劃，機器工具要增加到一百三十萬的總數，超過了美國在一九四〇年所用機器工具的百分

之三十。其他足以構成一個大規範工業的力量要素——如煤礦，渦輪，製鍊所，化學設備等等——一概大量擴充。

未提及原子能問題

這一有關蘇聯未來命運的文件，並未提及原子能的問題，不過，蘇維埃的代言人迭次宣稱，他們準備以最大的可能速度來發展原子能，發展原子能一事，在美國已經感到不容易；蘇聯在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上的技術能力遠不及美國，自然感到格外的困難，雖然蘇聯的科學家濛淡經營已經研究出原子分裂器的基本祕密，但是他的設備要跟橡樹脊（Oak Ridge）與漢福特（Hanford）一樣的建設起來，却需要集全國技術工人之精華，費五年至八年的時間。其餘如鑄鑄；抽水機，優等合金，以及電氣裝置等等，也應該有大量的出產，因為這許多都是工業上所必需的資源。

最後，紅軍——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軍隊——也要重新裝備，「以最新型的武器來保衛國家抵禦所有的威脅。」所謂最新式的武器，祇要舉一個例就可以明白，這就是實際上新的航空工業之創立。因為，紅軍的空軍力量並沒有新式長距離的轟炸機；蘇聯現在所用的戰鬥機，就以頂好的

講，也是已經被人廢棄不用了的。

凡此種種都可結爲一個慘淡的事實：蘇聯老百姓除掉必須做這許多工作以外，差不多不能再有能力做其他的事了。以國家言，投資於這樣偌大的一個計劃，要想再在消費品上增加生產，自然是不可能的了。五年計劃的本身，就能說明這一事實。緊身帶將在蘇聯繼續流行；可能再流行一個長時間。

老百姓與新五年計畫

蘇聯的老百姓未嘗不明瞭這些，他們也不一定就喜歡這些。他們表示接受，不過心裏有些感到不公平而已。他們之所以表示接受，因爲大多數人對於他們領袖的賢能還具有類似宗教式的虔誠。（對領袖不具宗教式虔誠的人，我相信是比較少數，這許多人或則緘默不言，或則被送至政治警察的勞動營「重加教育」一時期。）假使斯大林說大家還需要一個時期刻苦，流汗，吃薄粥，那末斯大林自己心裏最明白；但是除掉幾個職業性的黨同志外，其餘可說沒有一個人會對斯大林的話表示過份的歡欣，普通老百姓，過的生活太苦了，對於新的五年計劃表示異常冷淡的。

因爲這許多老百姓感到相當的疲倦。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他們就在戰爭的緊張狀態下過活着，

時時準備戰爭；尤其在過去的六年中，他們所會完成的勞動和自我犧牲，確是一件奇蹟。在蘇聯西部（這裏是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就是現在，他們也還不能不繼續做苦工。他們做苦工的目的，單是爲了要活；因爲他們除掉必須額外負擔新的工業計劃外，還得再做些苦工來維持生活。

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當我遇見瑪利亞德拉泰科發（Maria Treukova）時，她正築好一座房子。她現在是六十三歲了。她建築這座房子。完全靠着自己的手。她的工具是一把鋤鏟，一柄斧，和一個鑊。她的材料是土磚和一大車的木材，土磚是從後院挖出來的泥土再混以稻草做成的，木材是從沿街碎石堆裏面拾得來的。她又得着當地共產黨書記的協助，拿到幾片柏油塗好的紙來做成她房子的屋頂。

就以這時烏克蘭所有的材料而言，這樣一座房子可以說是相當的不錯了。這座房子位於茲伯累河（Dnieper River）的東岸，茲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epropetrovsk）郊外的額垣瓦礫中。茲伯城的郊外以前原來曾經一度是俄國的重要工業區。這裏有一萬戶住民，和不少的工廠。當德軍撤退時，他們轟毀了四十一個工廠，住戶則祇剩四百家其餘全燒光了。瑪利亞在燒焦的舊茅屋牆基上豎起新的牆壁，她也和她的鄰居一樣，要住在粗陋的隱蔽所裏面差不多達一年之久。

瑪利亞所住的新地有兩間房子，每一間有十二呎開方。門外有一個小小的避雨走廊。當我在

那裏的時候，這個小走廊用做劈柴的地方，放傢俱的地方，和養豬的地方。拿兩塊板隔成一隻角，這樣便可以把豬關在裏面了。這屋子裏面的用具：一是磚爐，它在兩房之間築成隔板的樣子，一是木櫃，一是凳，一是鐵牀，鐵牀是瑪利亞從區醫院的灰燼中挖出來的，牀邊鋪起一個麻布袋，壁上掛着聖母瑪利的肖像——這像是石印的，放在一個鍍金的框子裏面，看起來很光亮——還有一個擺鐘，這是她的兒子從德國帶回來的。牆上還有五個木釘着全家備換的衣服。

瑪利亞沒有肥皂，所以要保持衣服的清潔是需要化相當的工夫的。在理論上，她有資格每月購買一百格蘭姆的洗衣皂——祇有一小圓塊——。但是當我去訪問她的時候，當地的商店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分配那種物資了。有時她能够取得少量的蘇打，她就用蘇打來洗煮衣服。聶伯爾河岸上有一種特別的棕色黏土，聽說是有去污的功効的，於是瑪利亞就拿這種黏土來洗擦衣服，這種黏土一定是具有去污的功効的，因為瑪利亞的衣服——一個羊毛的頭巾，藍條紋的綿襯衣，舊的黑斜紋女裙——已經相當的潔淨了。瑪利亞不須擔憂襪子的問題。在夏天，她可以赤腳；在冬天，她用條布把腳扎好，一直扎到膝蓋為止，像是一雙高靴。

德勒泰科發(Trakova)的居家也用同樣的棕色黏土來代替肥皂。或則用木灰和以少量的沙來代替肥皂。美國化粧皂偶然也會在街角的地攤上發見——這是靠近敖德薩(Odessa)的水手商

人用來交換俄國酒和紀念品的——但索價高至八十五個盧比一小塊，等於佛雪萊一星期工作之所入。

瑪利亞的兒子佛雪萊 (Vasily) 剛剛在房子落成的時候退出紅軍。他告訴我，他希望製造一張桌子。假使他能找到足量的木頭，或者還要添製一張椅子，至於臥牀已經不必再添了，因為他可以睡在那個磚爐上面，現有的一張牀已經足夠大了，瑪利亞的女兒，剛從烏勒爾 (Ural) 外的——一個戰時工廠中回來，兩個人也可以睡在一牀的。瑪利亞的另外兩個兒子並不準備回家。

瑪利亞把屋內外粉刷得雪白，留下來的石灰還足夠將位在小園遠端的廁所外部也粉刷一道。她用來保持泥地的清潔的是一把用嫩枝扎成的掃帚。她廚房的用品——一把銅茶壺和兩個大錫罐（這是租借物資的遺物）——擦得精亮，瑪利亞也和大多多的烏克蘭婦女一樣，是一個整潔的女管家。而且，二十年來她曾經受到相當的「蘇維埃文化」，「蘇維埃文化」，大半是指衛生學的意思。

從居家的觀點來看，德勒泰科發的家庭，比烏克蘭城區大多數的住民要舒服得多。各大城市中破壞得最少的要算基輔 (Kiev)。在這裏，每人有六米突對方的住地，這就是說約有十呎長六呎寬的一條地板——比普通墓地略大——。臥室，廚房，餐廳，和儲藏室概在同一間房子裏面

。卡爾科夫（Khanikov）經過四次戰役，損毀房子百分之三十，所以在這裏官方祇准每人佔四、八方米突。有時就是這末一點小地方也不能全部配給，因為成千成萬的難民這時都回到他們半遭毀損的故鄉了。

結果便是過量的擁擠。這種擁擠的情形，是普通美國人所難想像得到的。假使你眞知道這一個道地烏克蘭家庭的生活情形，那末你不妨在你的屋子裏面，闢一間頂小的房間，把你的妻子和孩子們一起都搬進去住，同時把牀呀，換洗衣服呀，以及你認爲絕對不可少的器具呀等等也擺在一房。敲下幾塊石膏，剝掉大部油漆，假裝十五年以來未曾修理的樣子。移掉輻射器和烹飪爐，換上可以使冬季溫度不到過冰點的磚爐。擊去浴室裏面和別家合用的熱水龍頭，最後，邀請你那綠居的堂妹蘇非（Sophie）和她的四個小寶貝搬來跟你常久的居在一起。假使東西實在有點太擠，你不妨退一步想，你依然比許多蘇聯人舒服，這樣你就可以安慰自己了。我見過有許多地方，四家烏克蘭人同居於一室的情形。一個基輔的低級職員表示過，「這不是足以助友誼之促進，也不是一種合理的生活。」

戰前的蘇聯，一樣的鬧着房荒。在烏克蘭的任何一個城市中，每人一百五十方呎可以說是最不容易得到的了。平常人佔得更少。就我所能判斷的，房荒一事最引起大家的不滿，當局者也感

到異常的棘手。烏克蘭的政治監督聶其泰克魯爾夫(Nikita Krushchev)保存許多種類的樣品，——瓦礫木片，燻焦的木塊，以及其他各種蓋房子的材料。他把這許多種東西陳列在辦公室的桌子上。他對於善後救濟總署建築裝備之遲遲不到，常常表示憤慨。後來我想到克里姆宮之所以不願意從其佔領區撥兵，或者就由於國內鬧房荒和糧荒的關係。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個黨員，在工作上也負相當的責任的。他解釋給我聽：「當兵士們回家時，他們無心忍耐，無心去瞭解。他們過着冰天雪地的生活已有五年之久了，他們再也不願來聽我們講解將來的建設計劃，他們可以說：『我們已經把你們從納粹鐵蹄下救出來了——現在且讓我們一個住息的地方吧。』在他們一時得不到的當兒，他們便感到不耐煩，有許多人的德性就因此敗壞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我的翻譯員在靜靜的街上散步，（我們幾乎每一個晚上有一次散步，假使有時便衣警察跟着我們走，我不能去識破他，但我們要與街上的人談天。却也從來沒有一個人出來阻止。）正當我們走向基輔的中央市場南部時，我們碰見一個所謂壞了德性的年青兵士。我們把這個孩子攔住問路。他也跟我們跑了幾段路。他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別的情況是怎樣的」，顯然的，他也急於要告訴別人一些關於他的處境。

他也和許多紅軍的老兵一樣，依舊穿一件臂章和徽章都已卸去的制服。他不戴帽子，他的兩隻靴尖端已經破成一個洞。他說他的父親是一個陸軍上校，已經陣亡；他自己也曾兩次受傷；他對於在基輔所能找到的工作都不感興趣——他說：『這種工作祇能混麵包吃』——他沒有家。

他告訴我們，『我到處可睡，今晚在火車站上，明晚或者在朋友家的地板上。不過這裏許許多多的人都不比我舒服，我想我應該跳上一列貨車往敖德薩去；在那裏我有親戚，他們或者會讓我一個住的地方，無論如何，那裏總比基輔要暖和些』。蘇聯戰後之所以多罪犯正不亞於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大半由於退役的官兵沒有調整好的原因。去年冬天，莫斯科盜案層出不窮，政府竟不能不調遣一師團的騎兵來協助警察去剿除。在基輔，我每一星期，我總有三兩次被街上的槍聲驚醒，這類聲音是不是由於警察晚間開槍或者是兵士狂飲後以槍機作樂，我却無法斷定。報紙上從來沒有登載，因為在蘇聯犯罪的事實。如火災，汽車肇事，離婚案件，以及結婚案等。——從來不當做新聞看待的。

烏克蘭之所以怨聲載道，飢荒也是原因之一。但當我在那裏的時候，好像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在飢餓線上掙扎的，甚而瘦弱的人也還不多見。（事實上大多數烏克蘭婦女是十分秀麗的，她們天生來具有世界上最動人的外表，這或者是蘇維埃黃銅工業給予資本主義國家的示範），但是他

們的飲食却確是非薄的，是不合胃口的，是單調的。

假使你是一個蘇聯的主婦，那你得一早起來到店裏去採買東西。你之所以必須一早起來，一則因為你必須在商店售完貨物以前能夠買到食料，一則因為你遲到上工時，你的報酬便要減扣下去。蘇聯婦女幾乎全部做工的；因為即使租金和醫藥費很少或者完全沒有，丈夫一個人的收入也不可能維持一個家庭，（據我估計，現在烏克蘭工人的薪水平均每月三百到三百五十盧布，以美國之購買力來折算約值三十到三十五塊美金，新五年計劃的目的在把薪水的平均數到一九五〇年時升至五百個盧布），蘇聯婦女不大做文雅的室內工作，文雅的室內工作乃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比較柔弱以及比較未曾解放的女性所愛好的。你的工作可能是堆砌磚頭，平鋪道路，或者在一個建築工程上沖水泥，我看見蘇維埃婦女第一工作隊在那裏清除莫斯科街道上深達四英寸的冰雪。雖然氣候降到冰點以下，她們還是用鐵槌打碎冰塊，赤着手一塊塊地投入貨車裏面。

配給證

你採買東西時並不須往各店去跑，因為在你的配給證上已經註明你是指定在那一家商店裏面，可以買到東西的。而且，你可以相信你，所指定配給的商店——譬如說基輔普式庚街第六十九號

雜貨店——它所貯藏的貨物跟全城其餘三百家的配給店幾乎是完全一樣。例外自然也有，像那許多特殊階級——如軍官，科學家，教師，醫生，懷孕婦女，以及重要官吏等等——到商店裏去購買東西時，他們比較享有廣泛選擇貨物的自由。

這種特殊的商店，看起來和其他的商店一樣。但他們在陳列窗裏面，把新從聯合國救濟總署運來的奶粉罐堆成一個很精緻的金字塔。在這塔的頂尖矗立着一瓶克里米亞香賓酒。它的標籤上已經被蒼蠅沾污，而且顯得破舊，因為用來裝飾窗門已有許多個月了。買一瓶克里米亞香賓要化上兩個星期的薪水。這種珍貴的食品自然不大人買的。橫靠在奶粉罐旁邊的是斯大林的肖像。肖像是着色的，邊上飾着綉紋紙。肖像的周圍，是一些火腿、牛酪、醃肉，它們盡是石膏粉做的，目的祇在裝飾，因為這許多東西早已沒有存貨了。

當你踏進門時，你就會覺得你已經在一間用架子隔成三邊的小房間裏面了，架子前面唯一的器具便是一個木製的櫃檯，和一個會計員的小攤子。店裏面祇有一盞沒有罩的四十五瓦特的電泡。牆壁上掛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國外貿易部長甯科牙（Mikoyan）的像。店裏的職員包括一個經理——是一個中年婦人，她很快樂也很豪爽——和四個女店員。經理圍着頭巾，穿一雙黑皮鞋，身上加一件白色夾克，像是一個醫生的制服。夾克很清潔；因為依照規矩，她每晚必須洗滌

一次。店也打掃得很整潔，（衛生規則執行得很嚴格），最漂亮的一位女店員坐在貨攤裏面；這裏擺着一把算盤和一個錢櫃。算盤是東方的加減器，錢櫃是美軍K種配給品的盒子做的。

靠牆壁的一排架子上裝滿方形沒有紙包的黑麵包。每個大約有兩磅多重，索價九十枚俄國小銅板，（九分錢），有些純麥的麵包，價格要高一倍。其餘的架子上幾乎是空着的，雖然也有幾色高加索茶葉，幾種美軍配給品以及奶粉罐在上面陳列着，不過盡量拿它來作陳列品而已。其中除茶葉之外，概由救濟總署從美軍剩餘物資中購買得來。在一個房角裏放着一個圓筒，內裝鹹菜。在對面一角放着兩加侖罐子的花生醬。——一概都是美國軍用品的標誌——上面覆着一層舊的障地報，以防蒼蠅。

工作繁重的報酬

你一天可以買一塊半麵包——你自己得八百克蘭姆，因為你是鐵路橋樑工作隊中的「繁重的工作者」；你的丈夫得六百克蘭姆，因為他是邦計劃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的司賬員，工作是「輕」的。你又有資格每星期得配給一磅半的食物和一磅牛油或豬油；但店中已欠缺此種貨物，所以你可以得一罐奶粉和一半美軍什錦配給品來替代。最後你可以買到幾囀花生

舊用紙片包好，一個夸脫的鹹菜裝進你自己帶在身邊的錫罐。凡以上所買得的東西一概放入一個網袋裏面，這種網袋是俄國婦女照例用來做採買物品的。

你今晚的點心，就包括黑麵包和鹹菜，正如過去幾個星期的點心一樣。但是要是你是一個特別具有野心的主婦，（或為饑餓的主婦），那你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從露天市場上再買一些東西來增補配給品不足。

這市場祇有兩行板桌，位在一方用圓石子鋪地的中央，靠在基輔一條大街叫做克來許遮的克（Khrushchak）的旁邊。農婦在桌子的後面排成一隊。在每一人的面前擺有一張手巾或報紙，上面擺着少量的糧食。這一塊地方是計劃一個小花園剩餘下來的。照例有一畝寬。在一個集團農場上面，總有這樣一塊地方指定給每一家庭的。在這一片私有的土地上，自己所生產的東西，無論供給自己吃，抑或賣出去，抑或跟別人交換貨物，都聽你自由，與資本主義的方式完全一樣。一個農家的主婦，要是她節儉的話，她除供養家庭外，常常可以積蓄些東西，會到市場上去賣。一星期總有一兩次——她所積蓄的東西可能是四個雞蛋，六英寸大的硬臘腸，一罐醃漬胡瓜，一個生豬肝，一滿瓶的酸奶，一包向日葵的種子，一串乾菜。

不限價·黑市場中號鯉魚卅五盧布

不管你所帶去的是什麼東西，總可以買到很高的價格。因為那裏根本就沒有規定的價格表。這種買賣雖然是絕對合法的，但以經濟的眼光來看，不啻是一個黑市場。它吸收剩餘的購買力，供給那些稀少而無法配給的物資出路。除掉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少數物資以外，這裏可以說是城區居民食品的唯一來源，（蘇聯也有美食店或者「商店」，不過都由政府經售醃鱈，罐頭蟹肉等之珍品，其價格之高，遠非普通老百姓所買得起）。因為所有的各種油脂供給總量——大多是向日葵油和亞麻子油——每人每月平均不到一磅，肉類的供給甚而更少，因此農家婦女以十分之一磅的臘腸換得二十個盧布，以一隻小雞換取五十個盧布，乃是輕而易舉之事，就是一個不大不小聶伯爾河裏面的中號鯉魚，你也得要化上三十五個盧布（合三元半美金）。

然而，盧布並不如以貨易貨的那麼能够引起蘇聯老百姓的興趣。當你從人叢中肩摩肩地穿過市場時，你就會覺得什錦點心盒裏面的美國紙烟或者硬糖，或者咖啡精等等乃是最好的通貨，口香糖把蘇聯的農村婦女弄得莫明其妙，她們叫口香糖為「橡皮糖」。他們奇怪：橡皮糖並不營養，「爲什麼也放在軍用配給品裏面。不過他們爲好奇心所驅使，有時也用雞蛋來換收薄荷糖棒。

小包的檸檬精實際上一點也沒有價值，——這一點，蘇聯人和美國兵具有相同的意見。但，紙板的配給盒，塗油的紙夾裏，以及你手頭所有的空罐子，一概可以買掉。這許多東西在烏克蘭已有固定的市價。

老婦人賣衣度日

農村婦女所最需要的乃是布疋。大多數婦女都穿着東補一塊西補一塊的戰時衣服；有許多人甚至連一件衣服也留不下來。許多身軀高大的哥薩克女子進市場時，總是穿一件縫合的帆布外套，緊緊的扣在一件破舊的棉襪衣上。腳上穿一雙樺樹皮做的草鞋。假使你能省下一件舊汗衫或者是你的親戚當兵從德國寄回來一塊印花人造絲的頭巾，那你便可以拿到市上去賣，換到一籃滿滿的食品，或者兩百個盧布的現金。有一個老年婦人把這市場描寫做「怪的地方」。

她說：「我每月祇有三百個盧布的收入，但要養活我的家庭，却至少要六百個盧布。」

這樣一個老年婦人能够想出辦法來彌補生活費的不足，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她每一次總要賣掉一件衣服。所以她說：「這許多辛苦實在够使我們疲倦了。」

「這許多辛苦實在够使我們疲倦了。」這差不多是一句蘇聯老百姓的口頭禪，是我們所常常

聽到的。

政府未嘗不聽到這句話；黨的官吏散遍每一個鄉村，每一個辦公室，和每一個工廠，他們都是政府的耳目。克里姆宮的統治人物對於人民的困苦，人民的不滿意情緒，以及人民對於消費貨品的一致要求，都十分清楚。同時，他們相信這種不滿意的情緒並不足為政治上的危險——至少從未有此危險。美國人對糧荒和房荒也是抱怨的，但美國人抱怨的音調並沒有像蘇聯老百姓唱得那麼高。至於抱怨的性質大家都沒有什麼多大的差別，大家都不會醞釀成公開的叛變。

然而，蘇聯內部人民的不滿意，畢竟是蘇聯社會無生氣和道德衰頹的表現；它是足以阻礙新五年計劃的進展的。假使長此下去，很可能滋長為另外一次消極的抵抗。消極抵抗乃是斯拉夫農民特有的武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三三年曾先後發生過兩次，幾乎把波爾希維克的計劃摧毀得乾乾淨淨。

棘手問題馬兒不吃草還肯拖車嗎

因此，蘇聯政府現在有一個很感棘手的內部問題：如何在馬兒不吃草的條件之下使一匹已經疲倦了的馬再拖上十年的時間。蘇聯內部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差不多都由這一大問題和共黨要想解

決此一問題所作之努力而起。

共產黨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使用兩個辦法：一個是，盡力使這匹馬知道牠爲什麼不能得到更多的糧草，一個是盡力使這匹馬瞭解牠所得的糧食已經不算太少了，而且拖過了第二個山峯，那裏還有一整袋的糧食正在等着呢！

第一個辦法的運用自然拿美國做對象。蘇聯的報紙上把美國描寫得格爲可怕。因爲，除非使蘇聯老百姓相信戰爭之即將臨頭，原是很難使他們放棄舒服的生活從事於大規模國防工業的建設的。因此蘇聯政府必須告訴她們老百姓：美國是一個唯一足以與蘇聯爲難的國家，她現在正在準備變成一個非常危險的戰鬥國。在蘇聯報紙上總是責備美國的「反動派」，說美國「反動派」之發展原子能，「並非爲謀人類之幸福，乃以之爲壓迫及奴役他民族之工具」；所謂睦鄰政策，乃是一個帝國主義的計劃把拉丁美洲鍛鍊成一個危險的軍事和政治的集團。

這許多恐嚇性的論調不一定就能反映出蘇聯政府的實在意旨。蘇聯政府的確懼怕美國；但她懼怕美國不在目前而在將來。蘇聯政府很知道美國現階段的輿論不會允許將原子能用於侵略性的戰爭，而初從戰線上下來的陸軍也不因是一支嚴重的攻擊力量。因此從蘇聯報界的粗俗論調中可以度量出克里姆宮所感到的內部困難。困難的程度愈深，毀謗美國的聲浪也愈高。我們大可不必

把蘇聯政府對我們的毀謗看得太嚴重，蘇聯現在患的是肺勞病。

同時蘇聯政府很想盡可能的表示她是有供給日用消費品的能力的。蘇聯的富有階級以及特權階級雖然也有枉法徇情的情形，但對於衣食的分配却是相當合理的，並且分配工作的效率也是很高的。聯合國救濟總署運來的沙丁魚祇要在敦德薩起卸，過了十二天，所有烏克蘭的零售商店都會有沙丁魚的出賣。——這件工作在任何國家都是很快的，但在一個鐵路依然七零八落的區域裏面，能有如此效率，不能不說是一件奇蹟。

蘇聯很喜歡聯總

蘇聯政府不懼路程之遠，不辭跋涉之苦，以期求得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貨品，輸入從佔領區榨取得來的物資，足見這些物資對蘇聯的重要。就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情形而言，蘇聯政府會作空前的讓步。它同意外國的視察團遊歷西部各地，監查救濟總署物資的分配情形；因為非如此，蘇聯便無法取得此種物資。次以榨取佔領區的物資而言。蘇聯竟不辭割裂自己的政治咽喉，向各佔領國取得「損害賠償」。

所謂「損害賠償」，在蘇聯人民看起來，顯指他們所可染指的任何敵產而言，從冰淇淋製造

廠起以至於德國的兩輪車，收音機，酒杯，縫紉機，牲畜以及鵝毛枕等等。當我在那裏的時候，這許多東西以及其他許多種東西一概流入烏克蘭。在敖德薩，甚而手推的小車，也還留着羅馬尼亞城的標誌，蘇聯採用這種手段，實在不是賢明政治；因為當紅軍從羅馬尼亞或奧國的家庭中搬走一切傢俱時，他再也不能叫羅馬尼亞人或奧國人相信共產主義的威信了。不過，這不能說不當，即使蘇聯把德國及其附屬的貨物一起搬光，也不能補償他們在蘇聯國內掠取的以及毀壞的東西。

有一件最有意義的事，便是蘇聯在其佔領的德國境內已經建築了許多種工業——最顯著的是汽油，綜合橡皮，以及光學用品——其產量已超出了戰前的水準。在理論上說，蘇聯觸犯了劫取德國戰時工業之罪，然而，蘇聯需要業已製成的物品太急切了，自然顧不到理論上的問題。

蘇聯的宣傳機構用盡方法來掩飾消費物品的短缺。它告訴蘇聯人民，說是蘇聯人民的生活和資本國家比較起來，要舒服得多；而且蘇聯的存貨實在還是很豐富的。不過，蘇聯的宣傳苦心，雖極一時之奇觀，却並非非常成功的。

舉例來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明明有價值二萬萬五千萬元的糧食，衣料和裝備運往蘇聯，但在蘇聯報紙上——即使得着蘇聯圖書館管理員的協助——我從來沒有發現過有一項新聞是報導

這件事的。除掉幾項簡要新聞報導救濟總署的人物來往之外，談到總署機構的祇有三篇文章，而且這三篇文章都是激烈地抨擊總署的權任人選和以物資供給希臘意大利「反動派」的問題。蘇聯政府顯然不願承認她是需要外面的援助來救濟她的人民。

然而，救濟總署運入蘇聯的糧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烏克蘭人却非常清楚。因為他們看見每一個鐘頭上和K字配給盒上，都貼有美國的標誌。而且他們還表示非常的感激。後來他們竟在街上攔住救濟總署的代表要求代表們把他們的謝意，帶給美國人民，他們說：「美國人民是我們的朋友，請把我們的謝意帶給我們的朋友吧！」誠然，美國供給救濟總署的物資，確比其他國家多些。其他國家的物資——如印度的茶，西非的可可，澳州的毛毯等——都以散貨裝船；在商店的架子上，並不能立刻認得出是各該國的出產。因此，大多數俄國老百姓都以爲救濟總署完全是美國的。（然而，我們如果就此斷定美國的善意會產生實際上的價值，也不免過於樂觀；我從來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蘇聯普通老百姓的意見對於克里姆宮的外交政策是有着絲毫影響的。）

世界上最幸福者

蘇聯的報紙又向一般老百姓保證，說他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類。一位研究蘇聯生活最精細

的學者曾經說過，蘇聯的人民「全然被人蒙蔽」；他們也被蒙蔽得竟致於相信「在一個殘破不整的小資產國家裏面，除掉少數的特權階級之外，其餘的人都過着失業和窮困的可憐生活的。」凡是有關美國的消息，都經過一番縝密清理以後才准在蘇聯發表。所以在蘇聯的報紙上祇登載美國的罷工風潮，種族壓迫，以及勞工大眾的被人剝削等等消息。結果，一個比較具有普通常識的共產黨，總是不相信我所說的話。當我告訴他，在戰爭期間，美國的物價管制制度對於保護房客防止租金的無限止漲價確有相當的成績時，他老是表示懷疑。有許多人竟絕對不相信美國公立學校已准黑種人入校的事。凡是由流行的美國書籍翻譯為俄文的，也經過一番選擇，務期這許多入選的作品能支持蘇聯政府的需要。目前在蘇聯最流行的美國作者是斯退貝克(John Steinbeck)辛克萊露意斯(Sinclair Lewis)、德萊塞(Fredore Dreiser)福爾克納(Wilhelm Faulkner)以及辛克萊(Wilton Sinclair)。蘇聯的讀者便因此斷定聚居在美國的幾乎都是一些七零八落的中產階級。

然而，無論如何，各種懷疑總設法爬進每一個人的心頭。一個俄國人看見了一部道奇或斯丟特貝克的租借貨車的，他總不免會想到這許多車子畢竟比蘇聯工廠所製造的要好些。而且他常常可以看見這許多車子，因為這許多車子担負了一半以上的運輸。他也許在奇怪：一個「衰頹」的

國家怎麼也會製造出這許多不羨願的貨車來的。此外，很多的俄國兵在易北河或者在捷克遇着了美國軍隊時，他們覺得美國兵並不十分像被壓迫的普羅階級。

誘 惑

當紅軍進入德國和巴爾幹各國時，所發生的破綻更壞。那時候，蘇聯軍隊發現：即使在法西斯的國家裏面，每一件事物，從鉛管起以至女人的內衣止，差不多都比他們所看到的來得奢侈。結果，大家都激起了一個追求物質的或竟至肉體的慾望。蘇聯政府苦心孤詣，運用各種宣傳方法來防止此種慾望，畢竟無濟於事。

凡此種種都使得蘇聯政府的宣傳有加倍努力之必要它盡力使老百姓相信，自己的消費品正在加速度的增加生產，要是他們能夠略為耐性一點，每一個人都會享受到很多的東西。在蘇聯幾乎每份報紙長篇都登載增加消費品生產的文章，譬如靴，機織品，傢具等都在增加生產中，在新的五年計劃之下並且計劃作更進一步的增加。

有許多東西的增加，是確實的。斯大林曾經答應，在今年內結束麵包的配給。像鈕扣，平頭針，口紅，服飾珠寶等等，都已慢慢地也在店裏面發現了。毋庸配給證去購買的商店在本暑期

內自動削價百分之四十。現在一雙男皮鞋最整腳的要八十一元美金，最好的要一百六十元美金，長統絲襪子十二元美金一雙，男外套從一百六十元起至四百元止。柳條布衣服祇要三十元一件。這許多物品在配給店裏有時也可以買到，而且價格更加的合理，不過數量有限制就是了。

工人比較舒服

在某一點上——就我所能發現的，祇有這麼一點——蘇聯的工人確實比較舒服的。要是他在美國就沒有如此舒服。這就是：蘇聯工人需要看病時在任何時間都有絕對的自由。不過，其醫藥設備不一定是頭等的，因為蘇聯醫生的教育程度次於美國同等醫生的教育程度，而德軍所到過的地方，其藥品和設備的供給都是非常的缺少。舉例來說，假使你到克勤門沖的醫院去（Kremenc Jug Hospita）你必須自帶床氈；那裏的X光實驗室依然七零八落；外科醫生的橡皮手套也祇那麼一雙，他們是輪流的用着，如果你需要他用手術時，他必須等候他的輪值時間。不過有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的，所有的醫生都很誠懇，聰穎，有熱忱，就是在農村裏面，這種醫生也有相當多的。大多數的鄉村——和美國的小市鎮可以相對比——都設有醫院或產科院。因此，蘇聯農民比之於美國一般的農人可以獲得更多的醫藥上的方便；即使一旦遇有急病，也不致於有破產之慮。然

而，我們就因此斷定蘇聯的醫藥設備其目的絕對是替病人服務的，也未必完全正確。在蘇聯政府的眼光裏面，人力是武力的基本要素，祇要人力健壯，在武備上便勝人一著，這竟和維持坦克的力量有着同樣的作用。

初看起來，新五年計劃中增加消費貨物的目標十分動人。農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二十七；行駛的汽車數量至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建築或修復八千五百萬平方米突的住地；零售業總量較戰前水準增加百分之二十八。蘇聯的報紙好像是一面玫瑰色的透鏡，從這面透鏡裏看這許多東西，竟像從山上瀉下的冰雪塊泥塊石塊等一樣，一個人是能夠得到的。

然而，如果我們把這新五年計劃過細的加以檢討，便可知道事實上並非如此樂觀。關於住的計劃，每一老百姓祇能再增加不到一方碼的地方——如以目前的擁擠情形而言，一方碼的地方實在微乎其微。增加一倍的汽車數量祇能當蒂德羅（Detroit）年中生產量的一部份；而且這許多汽車實際上必須分配給政府官員，軍隊，以及運貨之用。私有汽車幾乎不曉得是否有。關於食糧的供給到一九五〇年時至少在澱粉方面是會足夠的。至於談到肉類，魚類，白糖，糖果，毛類，棉織品，鞋類等等，新五年計劃完全是模糊的。它祇說「到一九五〇年時市售的貨物將比在一九四〇年時大大的增加。」它祇希望「各種織物，衣服，編織品，以及鞋類必須無限止的改良。」蘇

聯的零售業，即使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她的貨物流通量依然比任何西方國家爲小，也許德國和奧國可能比她不如。蘇聯所能提高的生活水準也不過是從戰時極端犧牲的生活提高到僅僅維持生活的平時生活而已。

下一代的蘇聯人生活水準可提高

如果說克里姆宮在蘇聯人民頭上再加二十年或二十多年的困苦生活，是錯的，現在自然還言之過早。萬一戰爭再度降臨，蘇聯所受的困苦生活不過是換取生存的一點很少代價，要是沒有戰爭，那末出此高價所建立的重工業最後仍然可以用來生產平時生活之所需。在此種情形之下，下一代的蘇聯人民便可以實際享受到生活水準的提高。

然而，蘇聯的政策對其餘的世界有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使民主政治不可能在蘇聯早日成長。蘇聯老百姓並未真正參加蘇聯政策的擬訂。要是他們在政府裏面有決定性的意見，他們決不會容忍這樣一個政策。不管這個政策如何賢明以及如何的具有遠大的眼光，這樣一個政策畢竟祇有獨裁主義政治下，用一羣有效的政治警察和一個宣傳機構才能維持得住。

第二，使蘇聯的人民不能不和外界隔絕。要是政府允許老百姓大規模的跟外國人來往，那末

在兩個生活水準相互對照之下，就不免相形見绌。祇要百分之十的老百姓知道了外界實際情形，政府的宣傳勢必失去力量，不滿意的情緒亦將掀起一個軒然大波；因為自由世界的奢侈生活是富有誘惑性的，所以祇有最靠得住的黨內同志才叫他去和自由世界接觸。美國的每一雜誌滿載電汽水箱和真實清潔器的廣告，這在蘇聯看來，都具有使蘇聯腐化的影響。

而且，共產黨有一個最有用的武器，這武器便是他的座右銘——「蘇維埃聯邦是工人的樂園」。要是其餘的世界得有機會窺見蘇聯，共產黨勢必失去這一有用的武器。克里姆宮限制人民的口糧或者有其最好的理由，但這榜樣却不能叫外國人也起來倣效。因此，報紙的通訊員必須禁閉在都城飯店(MetropoleHotel)，他們所發的通訊必須經過極嚴格的檢查，遊客必須由主持旅行機關的嚴格監視。

一堵牆需要拆除十年不算久

蘇聯和外界之間築成的一堵牆——由這堵牆所產生的結果便是相互不信任和懷疑——必將延長一段很大的時間。這不純是斯拉夫的怪想，用言論自由去勸導不能除這個怪想，向他們說互相諒解是需要的，也不能消除這個怪想；這堵牆原是蘇聯政策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是保護新五年

計劃所不可少的。

我們要設法打消我們大驚小怪的態度，盡可能的和蘇聯合作。在未來的十年中，蘇聯的老百姓和其他國家人民間的「相互瞭解」是克里姆宮所不能做到的。要是我們承認這一事實，我們就不致過份的失望了。

蘇聯的統治階級

本文譯自(Harper's Magazine)十月號，亦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派往烏克蘭之代表費什爾(John Fischer)所作。費什爾因職務上之關係得有機會與蘇聯政府官員密切來往，其觀察蘇聯之統治階級，自較正確。茲特譯出，藉供國人明瞭蘇聯內部政治組織及其工作效率之一斑。

蘇聯共產黨，是一部控制「人」的機構，其控制效率之高，是以往從來不會有的。蘇聯共產黨是一個範圍極小巧而特權極廣泛的統治階級；他和他統治下的大眾截然分開，其界限之嚴格，足與歷史上任何一個統治階級相比擬。蘇聯共產黨是一種文官制度，不過蘇聯所運用的文官制度，其效率之高，遠在美國之上。蘇聯共產黨是一種陰謀背叛的結合，訓練極殘酷，內情極秘密。蘇聯共產黨是一部吉勒帕民意測驗箱(Gallup Poll)係美國民意測驗箱——譯者註)運用四百萬雙的耳朵，測驗一般的輿論。蘇聯共產黨是一羣血氣方剛的弟兄，他們一個個滿懷着最忠誠的情緒

。正如阿金森 (Brooks Atkinson) 所會說過的，蘇聯共產黨是「一部製造力量的機器」。然而，蘇聯共產黨却並不是一個黨。

蘇聯人對於「黨」字的釋意，是和普通的定義全然不同的；正如蘇聯人對「民主」一詞的解釋異於其他世界各地的解釋一樣。如果我們以為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是和我們的共和黨或民主黨相類似的，那我們就不免把他弄錯了。我們對於共產黨的不瞭解，就由此種錯誤的想法而起。要是我們能够把共產黨當做僭侶政體看，似乎更為確當些。

現階段的蘇聯政府，什麼東西都不像，祇是中世紀的西班牙政府還可與之相比。共產黨也和古代的宗教儀式一樣，把自命獻身於黨的人佈置在大多數的公開機關裏面（雖然不是所有的機關都有）；共產黨單獨製訂一個「真信仰」，凡是不遵從這個「真信仰」的人，均為異端邪說，由祕密警察絲毫不留情面地偵查和裁判；共產黨以救護人類自任，凡容忍國外異教徒的，便是罪惡。共產黨員和傳教士一樣，自詡能够把禍晉帶進黑暗的地獄；他們爲了達成他們的任務，不辭艱苦，冒險犯難。他們有時也和可爾脫滋 (Cortes) 係中世紀時西班牙與葡萄牙之立法院，由貴族僭侶及都市代表組織而成——譯者註）一樣，會覺得：在逼使別人改信宗教時，武力還是有很大的用處。

肖像學在忠實的俄國人看來，常常是一門極可寶貴的學問，可以始終沒有消滅，不過有點小小的改變而已。現在，列甯是父，斯大林是子，馬克斯是聖靈。他們的肖像差不多每一家都是供奉着的。（稱馬克斯爲聖靈確甚恰當，但現在馬克斯的遺像在各招貼上以及石印品上却並不常見，在我駐蘇聯期內，我祇見過五次。至於政治局裏面那十三位信徒的肖像却比較流行）。今日蘇聯藝術家之被雇用幾乎純然爲了頌揚這許多類似宗教上的人物，頌揚在此種信念下的聖人和烈士。藝術家的藝術，被統制得非常嚴格，其嚴格程度竟或不亞於中世紀的教堂之統制中世紀的藝術家。

聖潔的遺物保管在莫斯科紅區（Red Square）的列甯陳列館（Lenin Museum）裏面。每一個比較大的城市都設有分館，分館中陳列着各種繪畫和彫刻。列甯的信徒去參觀列甯的遺物時，他們必須脫帽；向列甯的書桌，列甯幼年時代的報告紙，以及列甯用以躲避克蘭斯基警察（Karev）¹係俄國革命領袖，爲一九一七年俄國臨時政府之內閣總理——譯者註）時所戴之假髮，致最肅穆之敬禮。最神聖的紀念物自然是列甯的遺體。它陳列在黑大理石的坟墓裏面，和拉佛拉墓地（Lavra Catacombs 在意大利，係一地下廊兩旁有穴足以容墓之墳窟——譯者註）所陳列的忠臣遺體一樣，也是不會腐朽的。每天總有一隊隊的人，前往謁墓；他們的神態非常專誠，非常肅穆。

蘇聯所採用的教育法是問答式的，不過略加改變而已。在幼稚園裏面，我曾經聽到過教師問學生：「你們幼年時代的快樂應該歸功於誰？」年剛四歲的幼童半吞半吐的回答：「哈！歸功於斯大林同志！」共產黨在一種最富有宗教性的傳統下，要求統制國家的教育。共產黨運用那種清教徒式的道德律管制人民的各種行動；結婚要管制，閱讀書籍也要受管制，怕的是有許多書籍會褻瀆了政府所會啓示的學說。還有一點，凡有公共集會，主席的開會詞，照例是一套歌頌領袖的文章。這在精神和祈禱並沒有什麼兩樣。

美國人總以為政黨是一個鬆懈的組織，祇要不怕麻煩，任何人都得登記做黨員，除掉偶然投票外，並沒有規定要負任何責任。然而，做共產黨員却和參加真正的耶穌會一樣的困難。要是一個人能够表示他的忠誠，他的活力，以及他那為共黨所需要的能力，那末他是受共產黨所歡迎的。然而，限制絕對的嚴格，祇有百分之二三的蘇維埃人才能取得渴望中的黨員證。

當一個年青的蘇聯人想做共產黨黨員時，他必須放棄他的世俗生活，而獻身於威柏斯（Weber）所說的「領導職業」。他放棄一切其他不同於共產主義的信念，基督教自然也在被棄之列。共產黨詆毀自由主義和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稱自由主義為「腐敗的自由主義」，稱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為「右傾歧異」。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或不信仰共產主義都是一些異端邪說；一個共

產黨員必須學會了如何避免這些異端邪說的方法。一個要想加入共產黨的人，經過這樣一番長期訓練，和研究神聖不可侵犯的書本之後，他的名字才得由三個老黨員提出。要是他的成績，他的品性，以及他對於馬克斯經典的知識經過考試及格，最後他才得宣誓就職。

從宣誓就職這一天起，他的生命便屬於克里姆宮的。他也許被派遣至維也納或北極圈去做報導的工作，也許被派遣至卡薩吉斯坦（Kazakhstan）去担任防止傳染病的工作，也許被派遣去訓練滿州的游擊隊，或者去鄂大瓦（Ottawa）偷竊原子彈的祕密。他並沒有私生活；因為他的行動，他的信件，他的思想都時刻在被監視之中。他受蘇聯祕密警察的監視，其受逼程度，遠過於一個普通的蘇維埃公民。要是他一旦喝醉了酒，或者在兩性問題上有不正當的行為，或者工作懈怠，或者對於黨的信心有搖動，他的黨員資格就有被剝奪的可能。如果他的罪嫌十分嚴重，他便要受處罰，送到勞動營去，或者竟被槍決，和一九三七年千萬共產黨員的命運一樣。如果過失不重，常常處罰他幾個月的苦工了事。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為蘇聯兩個神聖的紀念日。在這兩個紀念日到來的時候，虔誠的共產黨員照例要往紅區朝山進香，至少也要到當地的聖墓前致敬一番。他甚而剃光鬍子，正如和尚要剃光頭頂一樣；因為臉上沒有鬍子便是階級的標記，此種標記，除列甯以及加里甯之外現代的共產黨員很少是忽略了。

共產黨是經過這樣嚴格訓練的一個組織，他顯然有其強有力之處。他像一支精練的軍隊能够移動得很迅速，而且很祕密，不需要事前化費時間去討論，去求妥協。他可以吸收最能幹的人和最具野心的人，因為共產黨的組織是一個取得權力和取得一切榮耀的階梯。而且黨的內部行政也極端的有力。——內部行政由斯大林自己和瑪蘭可夫（Georgi Malenkov）指揮，瑪蘭可夫是一個磊落強健的青年——有能力的人可以很快地擢升到負責任的職位，至於懦弱無能的人却絲毫不留情面地被裁汰掉。

同時，共產黨也很可能吸收一些投機份子和一些狡猾的卑劣份子。今年夏天，蘇聯政府肅清工廠經理舞弊一舉，便足以說明這一事實。不過，我相信，這許多事實並不常見，乃是一些很少的例外。從前納粹德國常有貪污舞弊，抑鬱寡歡，道德墮落等等情事；但在我駐蘇工作期內，卻很少見到像這一類的現象。我和共產黨員一道工作的結果，大多數共產黨員給我的印象是：誠懇，忠實——其中有許多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總覺得他們是在爲着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目標而努力。

我在烏克蘭有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名叫佛雪萊（Vasily Vladimirovich Khomyak）的，可說就是這麼樣一個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運至烏克蘭，烏克蘭政府設立一個特殊的機構來處理物資的分配，佛雪萊就是這個機構的主持人。我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代表，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我幾乎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工作，而且常常工作到深夜。他是一個極有自覺心的公僕，也是一個可以暢飲幾杯的良伴。我從來沒有遇過一個人像他這麼有自覺心，像他這麼愉快的。

佛雪萊的身材並不高，瘦而強壯，臉色顯得疲倦，枯萎。他的儀態天生來是文雅的。他的表情通常總是富有忍耐性；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發過一次脾氣。他忍得了外界一切足以使他激怒的因素。當忍無可忍時，他不過是嘆嘆氣，搔搔頭，咬咬牙齒而已（佛雪萊的頭髮已經斑白了，而且相當的蓬亂；佛雪萊的門牙和二頭牙都是用白鋼質鑲的，很精緻，而且很光亮，因為蘇聯缺少牙瓷材料，普通都用鋼來代替）。佛雪萊是蘇聯政府中比較高級的官吏，他可以直接向閣員會議報告，因此他穿得起整潔的服裝。他通常穿一套莊重大方的灰褐色衣服，灰色的羊皮鞋，一件藍色的絲短褂。他的帽子是藍色的假鴨絨，上面綴着一叢芒。

遇有特殊情形，他就穿上一套藍灰色的制服和五顆獎章，每一顆獎章都有煎荷包蛋那麼大，是他在德軍後方做游擊隊上校團長時得來的。他那一隊一共有一千八百人，他們歷盡艱難困苦的

生活；有時整天挨餓，有時倒在雪裏過夜，有時一直衝至最危險的區域去行刺德國國防軍的前哨，然後又得趕快躲避追趕他們的那一蹤跡。（有一次一個納粹德軍少校正和一個變節了的烏克蘭女子結婚佛雪萊便算好時間在那一天去逮捕。正當結婚典禮進行得最熱鬧的時候，搶手們就把新郎新娘，以及觀禮的人一網打盡，佛雪萊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經過四年的緊張生活，竟把佛雪萊弄得未老先衰。他常常氣喘，心弱。他自己也公開的承認，他的生命不會維持得太久了。

然而，佛雪萊依然辛勤工作，其工作時間之久，竟可使其積勞致死。他在上午十時左右到達辦公室，下午五時左右離開辦公室，去用午膳。休息幾分鐘以後，又到辦公室辦公，直至午夜以後方才離開。工作時間之如此規定，一部份是由於波爾希維克的傳統；自從列甯以來，共產黨的領袖照例有工作至深夜的習慣，所以眼睛下面的紅腫幾乎變做共產黨員的徽章。不過，佛雪萊之須工作如許久的時間，還有另外的一個原因。他的工作相當艱鉅，並且複雜。一班同僚又是新手，並非完全可靠。同時，美國的研究人員又時刻向佛雪萊催逼有關蘇聯物資以及烏克蘭自有糧食之詳細報告。有一次，因為我們堅持要求他們給我們一個有關當地肉類和油類的產量的數目字，佛雪萊幾乎漏夜趕工，親自收集各種統計材料。這因為他缺乏一個可資信賴的人物去代表做這件

工作，來應付我們所規定的時限的緣故。

佛雪萊缺乏一班有訓練的低級人員。這確是一個弱點。但這一弱點不是佛雪萊主持下的機構獨有的，蘇聯每一個行政機構幾乎都有此弱點。佛雪萊左右的高級助手，有兩三個確是相當幹練的；但等而下之，便是一羣散漫的夥計和司帳，他們離開農村祇不過幾年的時間。

這一特殊的弱點，並不是任何個人的缺陷，也不是黨的缺陷，甚而更不是蘇聯經濟制度的缺陷。一個國家要在同一世紀裏面從愚昧無知的農民轉變到現代化的工業狀態，自然要遭遇這樣一個無可避免的困難。英國在工業革命的初期，也曾發生過同樣的情形。當時英國的轉變雖然沒有像蘇聯那麼急劇，愚鈍的農民雖然可以從容不迫地訓練起來，但其所遭遇之困難，依然與蘇聯一樣。

普通，無論是稱頌蘇聯抑或毀謗蘇聯，大家總把蘇聯的各種事物看做共產主義的結果。在我看來，事實非全如此。蘇聯的各種事物不過是工業革命在蘇聯發生得太晚的結果。在蘇聯，技術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大體上是同時發生的。然而，共產黨之以其更偉大之改革自豪——如農業機器之巨量增加，以及軍事實力之迅速滋長——亦是人之常情。十九世紀英國自由主義者之受擁護，原因是機器所賜與之幸福，恰與他們所提倡之資本主義理論，同時發生的緣故。反對共產

主義的人責備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正在準備工業化，工業化的後果便產生了許多罪惡——人口集中城市，工廠工人之失去獨立性，社會不平衡所造成的慘狀等等——而共產主義所產生之罪惡，也就是馬克思據以責備「資本主義」的罪惡。

基輔的公共建築物大部份都被德國軍隊所毀壞。所以佛雪萊的八十多個同僚，不能不住宿於普式庚街一座三層樓的房間裏面。這座房間是非常破舊的，匆忙中趕修完成的，牆壁的石灰還沒乾，聖氣很重；這裏很冷，每一呼吸，都會變成一片羽毛式的白霜；女孩子終日穿着大衣，她們的手指生着凍瘡，所以打字的效率很低。佛雪萊自己的辦公室在最高一層樓上，跟其他房間一樣的冷，一樣的不擺什麼傢具。裏面祇有：一張寫字檯，一張鋪藍布的長方形會議桌，一個破爛的保險箱，兩個玻璃水瓶，十二張靠椅。牆壁上却打扮得很新鮮，假裝得有壁紙一樣。牆上還掛着史大林，莫洛托夫，克倫斯恰夫（Khrushchev），史夫却可（Shcherbako），以及當地的波納斯（Bobby Burns）的肖像。這許多像都太大，和房間並不相稱。在佛雪萊的房間裏面，其足以代表個性的唯一物件便是他的鉛筆筒。這是石膏做的，形狀很小，上面刻着一條嘴裏含着個兔子的獵狗。

職員的工作很鬆懈，他們喝茶，談天，有時談得很長，而且無所不談。（把自己的時間作有

秩序的支配，乃是一個最巧妙的方法，這個巧妙方法，普通俄國人還沒有領會到。）各職員工作效率之不高，還有一部份是由於辦公室裏面各種設備的不完全。舉例來說，全機關祇有五架打字機——一千五百元一架——祕書們從來不曾看見過打字機上所用的擦字工具。我們借給他們擦字工具，釘書機和一捲蘇格蘭紙，他們感到非常高興，竟高興得和小孩子們看見了玩具一樣。電話機也是不够用的，而且常要出毛病，沒有一個俄國官是用電話來處理事務的，除非在指派人員的時候；但就是在指派人員的時候，也可能喊壞了他的聲帶。

因此，這一機關能够運用各種方法來獲得相當高的工作效率，實在有些料想不到的。每一個月總有二萬五千噸的救濟物資從敖德薩碼頭運至內部若干城市及鄉村，大體上，某一種物資均能按時到達某一個地方。而且，因中途被竊或處理不慎而蒙受之損失並不頂大；即使有，也就很快的處罰了事。至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物品在那裏是否有黑市場，我們却無法發現。

我們和烏克蘭政府來往的結果，發現烏克蘭政府的核心機構和任何其他機構的吏治制度完全一樣。——這並不是根據什麼正式的組織章程，而是憑着一個人事關係網，這個網相當的靈活。

在理論上，佛雪萊受烏克蘭共和國的省長克命斯恰夫（Pikta Khrustchev）和全部閣員的指揮。（內閣官員原稱人民委員，Peoples' Commissars——這名稱是列甫採用的，因為「牠含有極

濃厚的革命氣味」。部長 (Minister) 的銜頭是今年春天才定出來的，這銜頭表示格外尊敬之意。因為人民委員會的稱呼，也許由於幾年來反蘇宣傳的結果，使人聽之毛骨悚然。如果有一個戈貝爾向大家說：「你們喜歡不喜歡讓你們的女兒被一個喝醉酒的人民委員強姦的？」大家聽到人民委員的名詞，一定不寒而慄。但是，如果把人民委員的名稱代以部長兩字，這問句就不免十分可笑；因為部長的稱呼比較莊重，自然不會去強姦別人的女兒的。實際上，佛雪萊總是和閣員會議的副主席薩納 (I. S. Senin) 取得聯絡，在佛雪萊的上司中，薩納是他的保護人。

薩納是一個長得相當漂亮的青年，他的身材像是一個足球員，驟看之，很容易把他當做市鎮行的協理。一九三一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化學工程，現在他仍然歡喜說英語。他穿一套藍色條紋的衣服——就我所見過的，他所穿的是俄國最好的一套衣服——吸的是美國樂根牌 (Luck y Strike) 的烟。他說話富有幽默感，使人聽了非常舒服。他的職務是推動全烏克蘭的工業，所以他之患胃潰瘍一點也不奇怪。各國的高級官吏幾乎都有這種病。當薩納進入一個哥克薩斯山上 (Caucasus Mountains) 的療養院時，佛雪萊要想從其餘的閣員那裏得到很迅速的指示，感到相當的困難。佛雪萊說過：「他們一直把我的報告擱在紀錄簿下面不辦」，但是一當薩納照常辦公時，就立刻把佛雪萊的報告查出，手續迅速如前。

閣員的下屬對於閣員總是非常恭敬謙虛的，這使大多數的美國官吏弄得迷惑不解。舉例來說，當佛雪萊和薩納跟我們一同去參加一個會議時，佛雪萊老是在等候室梳理他的頭髮，摸摸他的領帶，刷刷他的鞋子。原來在蘇聯各機關的等候室裏面，總準備一個刷鞋的小架，這完全爲了訪客們的方便。一當進了會議室，佛雪萊避在一個最隱蔽的椅子上，聽話時神經極度緊張，祇當有人向他提出問題時，他才說話。

訪問閣員，是一件相當隆重的事。當我們的汽車駛至十一層樓的閣議所在地時，我們常常碰到服裝整齊的警官，他們衛護我們通過站在門口的哨兵和立在走廊邊上的衛兵。哨兵們是全部武裝的，衛兵提着步槍，掛着刺刀。當我走近某一門口時，門就自動的打開了；但一當我們過去時，門便靜悄悄地關上。（我不曉得這是什麼道理，也許是鬼怪）。每一個大人物的內進辦公室總有兩道門，這兩道門相距兩呎。每一道門上鋪着很厚的假皮，門鑰處的小洞，蓋一塊小的金屬板，目的在防止竊聽。

各閣員對於聯合國救濟總署運進的皮革分配問題，似乎爭持不下。一百二十七噸的皮革，貿易部主張大部用作製鞋；衛生部則堅持：祇少應該有四十五噸用作假手足的製造，還有一個人則主張把他所能得到的皮用來做工業上的皮帶。還有，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維他命，也引起他們許多

的爭執。衛生部把維他命列入藥品類，貿易部把維他命列入食品類。究竟應該列入藥品類，抑或食品類，竟爭辯了好幾個星期。

關於這一類爭辯，自閣議以下，都是有的。譬如：波爾脫佛（Polhava）的市長化了一整天的時間，陪我們參觀那七零八落的建築，向我們說明波爾脫佛的急切需要。最後，他招待我們吃飯，飲酒；他說：救濟物資應該如何分配給被戰爭破壞的城市，閣議總會有一個公平分配，他對於這個公平的分配寄與完全的信心。但他希望：當我們回到基輔的，我們能够在薩納面前爲他說一句好話，說明波爾脫佛的特殊情形。

這許多問題最後都由克俞斯恰夫（Kunustchev）來公斷解決。克俞斯恰夫是共產黨政治局裏面十四巨頭之一，很有權力。他已五十二歲，但看起來却起碼有六十二歲。他很像一個沒有鬚子的聖誕老人。據他的朋友說，在戰爭期間，他的工作很繁重，幾乎積勞致死。他是庫爾斯克（Kursk）一個礦工的兒子。他在一九一八年加入共產黨。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礦裏面工作。自參加黨以後，他擢升得很快，每任一件繁重工作，無不表現其優越的組織能力。在大清黨期間，斯大林派他去主持烏克蘭的黨務工作；因爲烏克蘭當地的政治領袖已經犯了賣國罪全部解散。直到現在，烏克蘭人雖然沒有忘記他是一個從外面來的人，但烏克蘭人一談到了他，總對他表示愛慕和敬

十五年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調查及報導各個官僚的言行，我會見過許多好的官吏，主持烏克蘭的人物所表現的，便是其中之一。他們的工作效率，竟可以和美國的林牧會社或威斯脫却斯脫那（Westchester Country）的共和黨機構相比擬。全世界工作效率最高，組織力最強的，烏克蘭政府中的人物，要算其中之一，他們確可以據此而驕傲。（一個典型烏克蘭市長所表現的全副熱忱，足使全城市民皆受感動，竟可使加里福尼亞商會的祕書視之有愧。我老是覺得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許多。）烏克蘭政府縱然遭遇着很多的困難，但在我看來，她們依然具有合理的誠實的，合理的活力，以及合理的工作效能。凡此種種德性，都應歸功於烏克蘭政府。

主持烏克蘭政府的人物，會以他們的全副誠懇，來辯明烏克蘭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在他們看來，民主政治就是政府民「享」的意思。他們絲毫不加懷疑，他們自信他們所做的事，確能為全蘇維埃公民謀福利的。無論如何，在他們看來，共產黨政治局所決定要做的事，總是對大家有利益的。

自然，他們也絲毫不加懷疑，認為他們的政府是民「有」的。至於什麼是民有的政府，他們却並沒有真正的瞭解。共產黨員把「非共產黨員大眾」看做一羣懶惰的，毫不機智的，蠢熊般的動物。共產黨員覺得：非共產黨員經過幾世紀的奴隸生活，已經變得麻木不仁；必須由共產黨員來誘導和訓練使之走向完美的社會才行。他們覺得：普通人沒有能力判斷究竟什麼對他自己有好處，因為他們除掉吃飽他的肚皮，穿暖他的衣服，在磚爐上睡足他的睡眠，幾乎不再有其他的要求；他決不會有什麼遠大的眼光，去選擇苦工來做，同時他也不會符合新五年計劃的需要，無限制的否定了自己。

因此，有關公共的政策必須讓給經過特殊訓練的領袖來處理。人民可以投票，因為投票是「民主政治」的傳統裝飾品，但在投票時，祇准寫一個名字；如果寫了一個以上的名字，反使投票者摸不着頭腦，這在共產黨看來，是不需要的。共產黨員認為允許第二黨參加選舉的觀念，是惡毒的。他知道共產黨無論如何總是不錯的，因為共產黨所做的等於神聖的啓示。別的政黨一定是錯的，別的政黨所散播的思想乃是一些異端邪說；要是允許他散播這些異端邪說，結果祇有禍害，除禍害外沒有別的東西。

這許多見解是大多數俄國人所贊同的，至少也是他們所默認的。在俄國史上，俄國人從來沒

有過民主政府和自治政府的意味，他們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麼，同時我可以說他們也並不特殊的需要民主。根據俄國人的經驗，「統治」一事已經變成職業統治者的事務；不管統治者是可汗，是沙皇，是人民委員。幾世紀以來的統治者都是殘酷的，獨斷的，無能的。現在的統治者同樣也是殘酷的，獨斷的程度已略減輕，至於能力却高過以往。這在俄國人看來是一種進步，幾乎每一個俄國人都對這種顯明的進步表示欣慰。

現在的俄國政府和人民比較接近，是過去任何一個政府所不及的。每一個地方的共黨領袖跟當地的人民保持經常的接觸，正如教區的牧師一樣。假使這個共黨領袖希望有一個光明燦爛的前途，他必須以泰姆納社交領袖（Tammany district leader）的熱忱來照顧他的人民。他要參加他們的婚禮，他要參加他們的鄉舞——也許還要選擇幾句有關領袖的頌詞——他要看看有沒有人需要另外的薪柴，有沒有人需要許可證去遊覽敖德薩的安脫泰雅（Aunt Tanya）。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必須以同情的態度聽取老百姓的怨訴。自然，決不會有一個人那麼蠢，會對新五年計劃本身抱怨的。老百姓所提出的意見也不過祇是有關如何實施新五年計劃之方法問題。如果老百姓的意見是合理的，那他就把事情決定下來，必要時且向基輔共黨總部報告。當各方面的批評很激烈而且接二連三的發生時，蘇聯政府可能更換當地的行政人員；也可能改變實

施政策的辦法。共產黨之消息極靈通，動作亦極為迅速。

老百姓的怨訴發生一個結果，即是：使德納帕羅帕撤羅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達納脫沙（Darnitsa）市區的政客也得出來看看。他們的舉動和辟脫斯堡（Pittsburgh）或門斐斯（Memphis）市區的政客一樣——他們是一羣性情外向，富有熱忱的人；滿面笑容，見人必打招呼，握起手來是緊緊的；對人名字的記憶力很強。有一次，我去卡爾科夫（Khar'kov）參觀一個幼稚園，領我到那裏去的是一個當地的政客，名叫彼得彼脫羅斐區汕區科（Peter Petrovich Sachko）。他在所有的小孩子頭上拍拍，最後發表一篇簡短的演說。演說時，他特別鄭重地介紹他自己的名字，幾乎十分鐘裏面就介紹了十次。你可以想像得到，下次選舉的問題如何懸掛在他的心上；因為，他的選民必須選舉黨所推舉的那一個候選人，而且祇能選舉那一個人，但是，那種不孚人望的官吏，黨是往往不會再予提名的。

大眾的輿論有時針對某個官吏而發，因為批評黨和批評政府必須分開。自然，黨和政府事實上是不能截然分開的，正和盧比的兩面不能分開一樣。但蘇聯的報紙常常把黨和政府截然分開。政府措置失當時，輿論老是歸咎於「官吏」和「官耗子」；要是政府措置有可讚美之處，輿論則又往往歸功於黨的高級人員；在他們看來，事業之有光榮的成就，完全由於黨的高級人員領導得

涉的緣故。

因此，烏克蘭的陣地報，在四月十七日那一期，就有一篇社論「鈕扣和鋼刀何以發生問題？」針對柴波羅茲式（Zaporozhe）的某些官吏攻擊。

該社論首先對「鈕扣，刀，叉，鞋油，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之不易買到」表示憤慨，繼稱：「地方工業辦事處——處長是白朗納可夫同志（Bronnikov）——去年以十七種工業品應市，其中有鈕扣，叉，匙等等，但發出來的祇有六種，而且就是這六種，也還找不到貨品。此類貨品，當地感到極度的恐慌……」

區合作社——社主席是馬令却可同志（Marinchenko）——應該出產一千五百個桶，但他祇製造了二百個桶；區合作社應該製造一千張藤椅子，但他祇製造了八十四張。若干地方工業領袖漠視原定計劃而不予處分。這許多事實之所以發生，完全由於柴波羅茲式編訂計劃時沒有顧到實際情況所致。他們實在缺乏設計能力和創造能力。」

在這篇文章裏面，沒有一處是提到共產黨的。——蘇聯有所謂「社會主義者的自我批評」，這篇文章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實，在那時候柴波羅茲式的大量人力和物資正依照新的五年計劃用來建築大鋼鐵廠，所以日用必需消費品就無法依照原定計劃製造出來。關於這一點，那篇

社論竟絲毫沒有提到。

沒有一個人能夠告訴我，白朗納可夫同志和馬令却可同志的下文如何，或者他們已經被調到另外的工作上去了。

四

蘇維埃政治制度的特點確有其強有力之處——訓練的嚴格和統制的集中——但他的優點也就是他的弱點。

最顯著的一個弱點，就是所有比較低級的官吏不願意負責任。因為事做錯了，便要受處罰，而且處罰得極為嚴厲，致使明達之人不敢根據自己的意見作決定。要是他弄錯了——不論其如何誠實——決不會說他是判斷能力的不行，可能就以怠工和賣國來定他的罪名，以「民衆之敵」的刑罰來處分。

結果，他無論辦什麼事，都要格外的小心。他在每一個文件上，必須要求許多人的副署；他在辦事的手續上，必須要和他的長官以及當地的黨部領袖弄個清楚；他在辦任何事件時，必須準備許多詳細的紙面記錄。結果，多出來不少的會議，不少的麻煩手續，最後便是工作的稽延。我

第一次和俄國官吏接觸，是在柏林。當時有一個名叫勒貝素納（Lebensohn）的俄國貿易代表，他爲了要取得一個文件准許我們上飛機赴莫斯科和他的同僚以電話交涉幾達二個鐘點之久。最後，他祇得到一張祇准他自己簽名的許可證。真的，蘇聯的麻煩手續並不比在柏林的美軍差些；但在蘇聯，幾乎每一種來往都要經過一番困難重重的手續，這種手續，在別的國家，乃是祇限於軍事方面的。

俄國官吏中也有爲了迅速完成某件工作，憑其血氣之勇，擅自拿出他自己的主張的；但即使有這樣一個人他也不能運用他全部的責任。因爲在每一個機關裏面，主持機關的人往往分爲三派——一派是名義上的管理人員，一派是黨務人員，一派是祕密警察。我會認識一個醫院院長。他有一個部下，是這個醫院裏面的區黨部書記。院長的一切重要工作如果沒有事先和他商量過，是不敢去做的。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局，以及每一個集體農場的員工之間，都有類似的共黨組織存在。他的主要任務在事前預防怠工或避免拙劣的工作。同時，經理人員以及區黨部的委員都深受祕密警察的監視，因爲在每一個重要的機關裏面，總有祕密機構的設立。他們那許多警察特務，身邊放有鑰匙能啓開所有的保險箱和內室；沒有一個訪客，沒有一次電話能夠逃出他們的注意範圍。

蘇聯在國外的各種機構中，也有同樣的組織在活動着。舉例來說，根據加拿大皇家委員會對於俄國偵探的研究報告，蘇聯駐鄂大瓦的大使館裏面，有一個二等祕書，名叫高沙羅夫同志（Comrade Goussarov）的，他的權威就等於「大使的等級」，因為他是大使館中的中央黨務委員會組織處處長。還有一個二等祕書名叫巴夫羅夫同志（Comrade Pavlov）的，他負責祕密警察的任務，他的特務有時還要去監視由大使館武官薩波汀上校（Colonej Zaptin）所領導的那個偵探網。

蘇聯共產黨派往華盛頓活動的主腦人物，一般人都認為是薩羅夫（Serov）。他是蘇維埃購買委員會裏面一個低級職員，據克拉夫夫却可（Victor Kravchenko）說，薩羅夫是「蘇聯派往美國一個最具權勢的人物」，他的「話就是法律，下至最低級的蘇聯雇員，上至最重要的人物，都須聽從他的話」。克拉夫夫却可是一個背棄共產黨的共產黨員，他從購買委員會裏面逃了出來，上面的話是他在最近著的一本書裏面所描述的。（克拉夫夫却可最近著有 *I Chose Freedom*）一書，內述共產黨內幕甚詳——譯者註）。

蘇聯爲什麼要把一個機關的責任分由幾種人員去擔當，而不使之相互信任。這一基本的理由完全出於蘇聯的恐懼心理——這種恐懼的心理是蘇聯僧侶政體中最主要的特性；克里姆宮的人物

總覺得無論國內或國外有無數的危險向他們威脅。此種心理存在一天，他們便一天不能對其下屬寄與全部的信任。

蘇聯爲什麼要把一個機關的責任分由幾種人員去担当，而不使之相互信任，還有一個理由，這便是共產黨歷史傳統的關係。共產黨原是一個陰謀背叛的組織，他曾經跟沙皇時代的警察特務和絞刑吏作生死之鬥。因此，他也祇有發展他的反間諜組織和祕密組織，以殘酷的刑罰作後盾，才能保持自己的不被消滅。時至今日，共產黨的組織雖已握得政權，但過去的一套作風却無法擺脫。凡是在幼年時代曾經度過陰謀背叛的生活的人，很少能夠完全破除他過去所形成的習慣——就是樓梯的脚步聲，他也要留心靜聽，他沒有一時一刻不在恐怖之中。蘇聯共產黨的情形就是如此。即使在國內，共產黨也還維持其半陰謀的作風。沒有一個人敢於自由談論共產黨的事情，共產黨的核心工作也從來不會在報端披露過。共產黨黨員很少知道除他自己那個圈子以外的事，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動作負責，好像他們依然在做地下工作一樣。

這種殘酷的陰謀傳統也產生了幾個很有趣味的結果。一個結果便是俄國人的急癩主義（*Urges-tbeaverism*）。尤其是蘇聯派往國外的代表特別犯了這種毛病。幾經考驗的蘇聯愛國份子很明白：他們身處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誘惑之下，是受着雙重監視的；他們也很清楚：他們在國外必

須要獲得結果，否則，便不行。因此之故，一個俄國人被遣送至國外有所交涉時，他常常想盡辦法來表現輝煌的成績，證明他對國家的忠心，他所盡的努力，幾乎是具有歇斯的里亞式的。舉例來說，蘇聯在華盛頓的購買委員會顯然奉到命令，盡所有的力量來獲取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物資，並迅速裝運回國——同時克里姆宮決不輕易提出糧食恐慌的藉口，也不表示蘇聯正需要別國的協助。

蘇聯派往國外之代表幾於無孔不入。其得寸進尺，一步緊逼一步的要求；其不厭繁雜，曲盡欺詐的精神，確為世界之冠。一羣羣的斯拉夫人，包圍着聯合國救濟總署的辦公處，以及農產收購辦事處，要求知道：為什麼引擎契約不照定單配貨？為什麼兩噸三葉草種子的定購單，遲了十分鐘再簽字？他們一個個憤臂揮手，情緒異常激烈。

自然，蘇聯代表們並未如其所願，他們的各種動作祇會產生相反的結果。美國的官吏實在很討厭一個俄國人的聲調。俄國人催逼得愈利害，美國人偏不答應。美國人有時之所以變得如此頑固，這完全由於不勝俄國人之煩擾的緣故。最後，蘇聯自吹自擂以及得寸進尺的政策對蘇聯的代表祇有壞處，沒有好處。

蘇聯的急瀾主義在國內也發生很大的反響。今年夏天，蘇聯政府清查各主持工業的官吏時，

發現生產數字之普遍假造；假造的原因固然由於人類愛好虛飾的通性，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由於政府不合情理的強迫所致。政府強迫每一個工廠的經理把生產紀錄提高，但因為材料的缺乏，精鍊技術工人的不足，或者設備的不完整，生產數字往往不能符合預定的計劃。當工廠的經理無法提高生產符合計劃時，他唯一的辦法，祇有虛構數字。因為，虛報數字被發現了，固然有被處罰的危險；但成績不能符合原定計劃時，一樣的有被處罰的危險。

共產黨的陰謀，已經形成一種習慣，陰謀便需要祕密。而共產黨的祕密却又產生了幾個很不幸的結果。一個結果是，在任何國家裏面，普通應該知道的公開事件，而共產黨員絲毫不曉得。舉例來說，佛雪萊是烏克蘭各官吏中最熟悉聯合國救濟總署活動的人物；然而，華盛頓，倫敦以及其他有關各區的聯合國救濟總署都雇用了俄國人，他却並不知道有這麼一會事；當美國人把這件事實告訴佛雪萊時，佛雪萊甚表詫異。同時，佛雪萊對於蘇聯購買委員會的工作以及蘇聯載運救濟總署物資的動態，也祇有一點極模糊的觀念。

俄國人對於自己的政府既很陌生，對於外界究竟如何，又絲毫不曉得，結果，俄國政府要想從低級職員裏面提拔幾個能幹的人物，任以外交工作，確有相當困難。因為公務上的必要。我會和一個俄國對外貿易專家來往過，這位專家老是以爲菲爾特爾菲亞(Philidelphia)是在美國的

西岸，而且他編譯運輸路程時，也根據這一觀念。

五

上面所說的那許多缺點，如果和蘇聯政治機構的缺點比較起來，還是小焉者。蘇聯政治機構確有兩個真正嚴重的缺點。一個缺點便是決定之權過份集中，另一個缺點便是公務員的思想盲目的固定。

在戰爭期間，我們大家聽過很多有關獨裁政體的批評，覺得獨裁政體決事迅速，實在有其可欽羨之處。然而，獨裁政體決事之迅速，祇能應用於大題目上，譬如把整個的國家從平時很快地轉變到戰時，這就需要迅速的決定。但有許多事需要經過一個長時間的公開辯論，不必決定得太快。因為，決定得太快，萬一失足——如希特勒慕索里尼然——結局可能很慘，而且不僅是獨裁者個人的慘。

一個高度集權的政府，對於瑣碎的事，決不會決定得太快的。這一點，雖不為大家普遍承認，但事實確是如此。我們在前面說過，事權的高度集中便是低級職員的不願負責任。結果，有關普通問題的無數案卷——如是否要鋪設二十哩的路，何時應增雇書記——便在高級當局的辦公桌

上堆積如山。一個人的體力有限，要想迅速地處理竣事，乃是不可能的，祇要是處理過戰時華府的人，總會有此經驗。

要是此類問題不能當場迅速地處決，整個的政府機構必致阻滯。舉例來說，當蘇聯的購買人員聽到，某種牌子的機器工具不能在美國立刻得到時，他不能把此項契約轉換為另一相同製造品的契約，因為他必須等候莫斯科的指示，可能等候至數星期之久；而在此等候時期內，俄國的工廠却在停頓之中。一個蘇聯領事甚而簽發護照，都得打電報至莫斯科請示核准。當我準備離開莫斯科時，爲了獲得出國許可證，竟費了三天的時間，而且經過幾個高級官員的協助。諸如此類的事情，事很細小而耽擱的時間却很多。其影響所及，必致浪費人力，可能成爲蘇聯迎頭追趕西方國家的途徑中所遭遇的一個永久阻礙。

這一類的阻礙不是效率專家或精明的經理才所能治療。我相信，這是一個大規模的集權機構中所固有之特性。縮小範圍來說，在我們的大公司裏面也有此種情形。在美國，無論是經濟方面抑或政治方面，其決定之權分散於無數個的獨立單位——邦議會，貿易聯合會，學校區，小企業，T U A，農業合作社，港務管轄權，公共水電區，等等——像是毫無秩序，一場糊塗似的。但是，美國此種習慣却潛伏着一個特殊的力量，這一力量，連我們自己也還沒有充分的去欣賞。

他。

俄國人還有一個更基本的阻礙，這就是思想的過份僵硬。每一個受過馬克斯主義教育的人，似乎差不多都犯着這個毛病。有訓練的共產黨員，老是依循一個公式去思想，他相信這一公式會供給我們對於每一個問題得出正確的答案。如果某一件事實與公式不合，他連做夢也不會去修改那個公式；因為修改公式便是異端邪說，他還是乾脆的拒絕了那個事實好些。

一個經典式的例子便是共產黨對於美國黑人的政策。斯大林最初以列甯僚屬中的種族問題專家知名。斯大林擬了一個計劃，在俄國實施極有成績。依照這一計劃，各民族分別成立「自治」的共和國，因此烏薩柏克（Uzbeks），脫脫斯（Tatars），克薩克斯（Kazaks）以及蘇聯境內之其他民族均得保持其各別之文化遺跡。在美國的共產黨員抄襲了同一公式，而且抄襲得一字不差，作為解決美國種族問題的標準。他們建議在南部各州的中心區劃出一部份地方成立一個黑人自治共和國。

可是很不幸的，這一藥方並不會考慮到兩個彰明昭著的事實：（一）許多黑人並不願意住在南部；（二）幾乎沒有一個黑人期望成立一個黑人共和國，因為這樣一來，勢必召致永遠的歧視，歧視乃是他們真正的隱憂。結果，黑人並沒有羣集在一起，付出任何代價來購買那服專賣的

藥品。否則，黑人可能成爲共產黨最容易收買的人，最容易使之改變信仰的人。然而，到了今天，共產黨員始終沒有改變他們的公式。他們對於黑人的頑固，對於黑人拒絕斯大林所開出的那服良藥，表示慨嘆。（中亞細亞各種族，對於那服良藥，最初也閉緊嘴唇，不願接受，終因紅軍逼迫，不能不咽下喉嚨。）

蘇聯政府用這樣一個固定的標準來訓練共產黨員的思想——而獨斷一切的那幾個人又那麼不瞭解外界的情形——共產黨員要想把他們的活動擴張到蘇聯的境界以外，困難祇有一天的增加。

在歐洲每一次選舉裏面，天主教黨之反對共產主義，刻已證明其有效。在信奉新教的國家如英國和美國，此種反抗力量勢將格外的頑強。

在我看來，共產主義的要求，本質上是富有宗教性的。他不但提出一個政治的計劃，而且指點一條救世之路。他的教儀雖以物質主義的措詞來表白，但他要求一種神祕的虔誠，超越其他一切的忠誠。還有一點，共產主義傳授一種權力至上的神學。克里姆宮，他像是一種紅色的教皇宮廷，他是發出信念的唯一源頭，他要求在各種問題的學說之上握着獨斷的權威。

有許多民族，他們解釋宗教上的信條，祇是爲了適用於自己，他們幾世紀來已經形成了習慣

，蘇聯那一套神學不容易見信於此種民族。新教的傳統依然具有力量，即使像有許多美國人那樣已經不再進教堂做禮拜了，但在他們之中，此種力量也還存在。至少，如果有某種權力企圖凌駕乎他們的良心之上，他們總得加以攷慮，不致立刻接受。而且，他們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即是容忍各宗派的習慣；他們有一個信仰，即是信仰正義乃是存在於個人的行爲裏面，而非存在於僧侶政體的盲目服從裏面；他們有一個認識，即是認識消滅異己的行爲是舊式的，野蠻的。這樣一個民族決不會接受共產黨消滅異己的殘暴行爲；也不會接受不分皂白的理論，說是祇要遵從主義，不論欺騙，姦詐，屠殺，在道德上總是對的。

共產黨員有一個堅強的組織制度，此一制度已在蘇聯行之有效，我們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便是傻瓜。但是，如果說同一制度也可以在西方的世界裏面行之有效，這也不免犯了幼稚病。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認識蘇聯（全一冊）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人 邵鼎勳
發行人 杜召棠
出版者 建國書店
總發行所 建國書店

合川	無錫	分	建	建	建	杜	邵
武	昌	支	國	國	國	召	鼎
昌	宜	店	。書	書	書	棠	勳
南	昌	揚	南京太平路七十七號	南京太平路七十七號	南京太平路七十七號		
天	廣	州					
津	水	蘇					
北	陽	州					
平	口	高					
藩	漢	郵					
陽	口	蘇					
	常	州					
	熟	店					

7
17 6226

337

337
2722



116
209